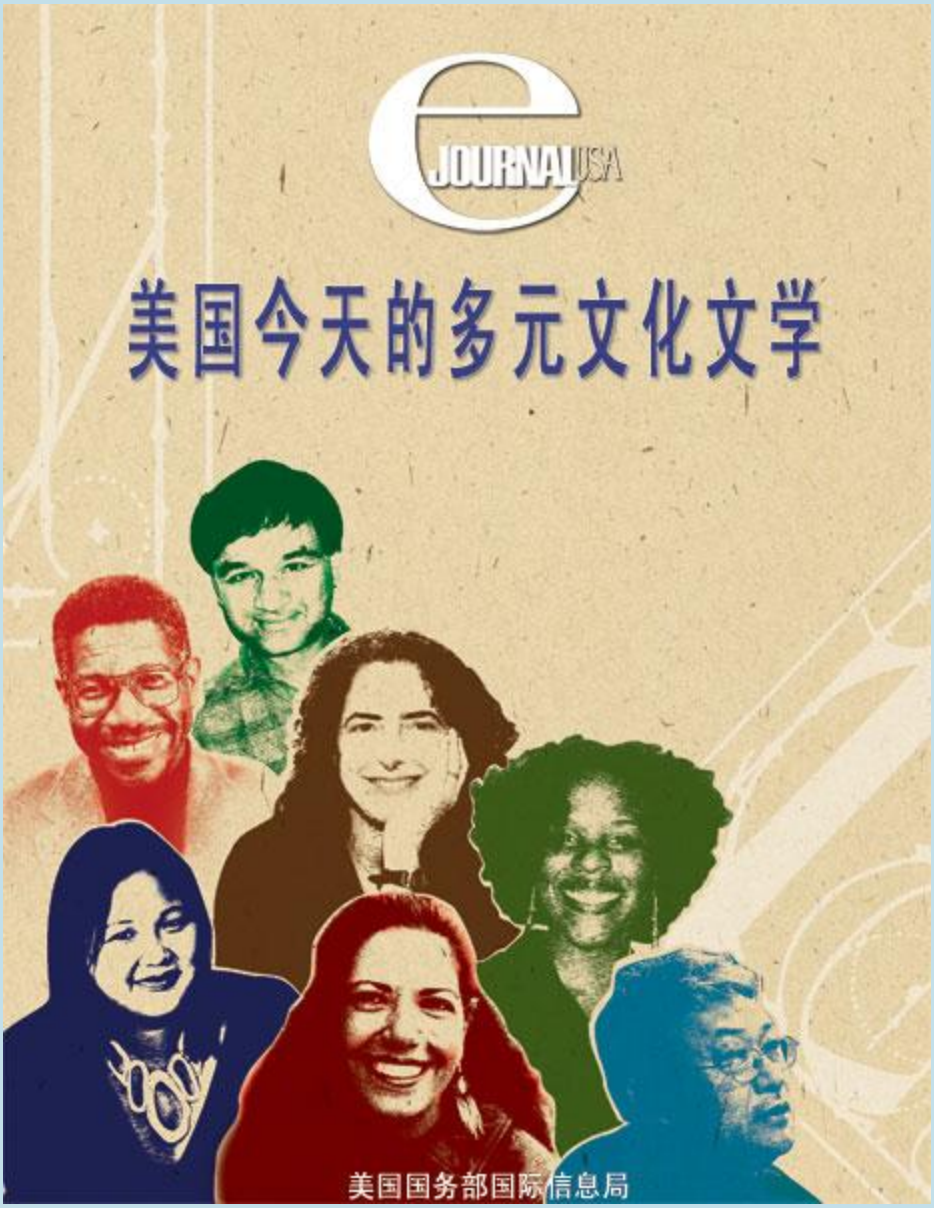

美国今天的多元文化文学

来自各方的移民使美国文化多彩多姿。本期《美国电子期刊》（eJournal USA）收集了不同族裔背景的美国知名作家的文章或文选。他们的故土文化视角和身为美国人的经历为促进跨文化的理解与欣赏增添了又一宝贵机会。

美国国务院 2009 年 2 月，第 14 卷第 2 期

目录：

内容简介.....3

我们一国众声.....5

处于十字路口的文学.....9

狗精灵：或曰，我的小说处女作诞生记.....12

从卢旺达到美国：通过写作达到超越.....17

什么是美国黑人文学？.....21

文学创作弥合混血民族之间的鸿沟.....25

记忆凝成的诗歌.....28

摘下云彩.....29

世界上最坚强的印第安人.....30

教授做人的艺术.....33

黑脚吟游歌唱家歌唱传统.....37

美国幸运饼.....39

书海寻友.....42

语言的背叛.....43

新移民故事：朱诺·迪亚斯和拉美小说.....44

失落之城电台.....46

捕捉云朵.....47

以族裔的多棱视角写作.....51

一位印度裔作家的经历.....54

对我写作产生影响的因素.....56

《六十九美分》.....57

我的文学之恋.....60

相关资料.....61

内容简介

500年来，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踏上现今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土地寻找自由与机会。他们当中的作家以书信、日记、诗歌和书籍记录了从早年殖民时期到今天的经历。正如玛丽·阿拉纳(Marie Arana)在她的文章中所写道："我们是一个由多种声音组成的国家"，而这也正是本期《美国电子期刊》"美国今天的多元文化文学"的主题——展示来自不同族裔的声音如何在文化艺术交流中增进理解，同时使美国社会变得丰富多彩。

新移民也许会倾诉他们的孤独，就像20世纪初抵达"花旗之国"的一位不知名的中国移民所述——他在旧金山附近天使岛移民站（Angel Island Immigration Station）的墙壁上写下这首思乡诗：

西风撩抖我的薄纱衣。
山上高房里有间木屋。
我多希望能驾云远去，
重新与我的妻儿团聚。

移民来到一个新国家无疑面临着适应新生活、学会新语言，逐渐熟识新邻居的挑战。 本期电子期刊展示了来自不同族裔背景的人彼此融合的经历以及通过相互交往而打开的视野。

哈金、伊马丘蕾·伊利巴吉萨（Immaculée Ilibagiza）和拉拉·瓦彭亚（Lara Vapnyar）是选择用第二语言——英语——写作的新移民，他们用英语描写自己的故国和新家园美国。 奥费利娅·塞佩达（Ofelia Zepeda）和苏珊·鲍尔（Susan Power）是美国原住民族——美洲最早居民——的后裔，她们的作品根植于自己部落的古老传统。

杰拉尔德·厄尔利（Gerald Early）的文章 "什么是美国黑人文学？"综观从黑奴时期、民权运动到今天通俗嘻哈小说之间的数百年创作发展，说明"贫民区文学带来了黑人文学的民主化，使其影响范畴和内容得到扩展与深化。"美国黑人作家塔亚里·琼斯（Tayari Jones）等人的作品则以自身扎实的美国南方生活经历为基础，富有特殊的地区韵味。

阿基尔·夏尔马(Akhil Sharma)描述了他的二元文化生活和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对他的写作的影响。他写道：“由于这一波亚洲移民潮引起了美国社会对亚洲家庭生活的好奇，我的作品幸运地得到读者接纳”。分别具有二分之一伊朗血统和阿拉伯血统的波西丝•卡里姆（Persis Karim）和黛安娜·阿布杰比（Diana Abu-Jaber）回忆了在自己家中学会融合两种文化的经历，华裔作家李竞（Jennifer 8. Lee）则通过幸运签饼背后的故事描述了美国对其他文化的同化。本刊中的很多作者都谈到他们在保持本族裔特征的同时具有的美国归属感。

美国人希望参与多种文化体验的热情空前高涨，包括欣赏音乐、艺术、品尝不同族裔的食品风味——并在这一过程中与阿拉伯、韩国或危地马拉餐馆老板结下情谊。许多时候，他们干脆就让自己沉浸于书中描写的生机盎然的不同文化中。

— 编者

我们一国众声

玛丽·阿拉纳

每四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人有着很强的异国背景；从多元文化中诞生了清新而充满活力的美国文学。

玛丽·阿拉纳(Marie Arana)著有传记《美国女孩》（American Chica）以及两部小说《玻璃纸》（Cellophane）和《利马之夜》（Lima Nights），并编辑出版了《写作生涯文集》（The Writing Life）。

美国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 任期1965-1969年)曾说："我们以美国的多元而自豪。美国因为由多种不同特征汇聚而成而格外丰富多彩。"

这一点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千真万确。今天，每四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人有着很强的异国背景；五分之一以上的人出生在美国海外或父母当中有一人是移民。我们是一个由多种声音、多方历史组成的国家——是艺术世界的沃土。一种崭新的美国文学必然会从这一充满活力的多元文化中孕育而生。

然而，美国多元文学的诞生并非一帆风顺；各种因素都曾可能阻碍它的生长。但幸运的是，它在这片自我意识非常活跃的土地上得到了发展。马克·吐温、威廉·福克纳和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奠基之作竟然能再现三种截然不同的美国。到二十世纪50年代，一批新型作家开始涌现——他们的作品力图展现具体族裔而非整个国家的精神风貌。于是，出现了索尔·贝娄和伯纳德·马拉默德感人至深的美国犹太人小说；拉尔夫·埃里森悲哀的种族歧视故事《隐形人》。（注：作家姓名和作品名称的英文原文列于文章结尾后。下同）

然而，远在此之前大约100年，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便以奴隶生活叙事故事开创了美国黑人文学先河。奴隶制被废除后，黑人文学带来杜波依斯的激昂文风，兰斯顿·休斯的非凡意境，以及后来詹姆斯·鲍德温、理查德·怀特和格温德琳·布鲁克斯等人的大量杰作。然而，只有到了上世纪70年代，黑人文学才开始畅通无阻地流入美国文学的主动脉。随着托妮·莫里森、艾丽斯·沃克、伊什梅尔·里德、马娅·安热卢以及牙买加·金凯德等作家的出现，美国文学中最原生的一支开始汇入主流。

跨越文化鸿沟的桥梁

然而，超出黑-白美国范畴的多元文学又经过一些年后才问世。这一新浪潮的先驱为汤亭亭1976年的畅销作品《女勇士》。这是一部高度虚构的回忆录，其手法大胆，令人耳目一新。作品打破了一切常规，时见中国先祖阴魂出没，现实与梦境相映生辉，人物时空交错变幻，向跨越文化鸿沟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小说家桑德拉·西斯内罗斯曾对我说，"我年轻时读过那本书，心想，'哇！你能那么写？' 你可用另一种语言、另一种神话来思考，但可用英语来写作？ "于是，美国文学新时代随之到来。

对于拉美裔作家来说，多元化发展产生于真空，因为此时拉美文学的繁荣期恰在孕育之中。加西亚·马尔克斯、卡洛斯·富恩特斯和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等人的作品正在被大张旗鼓地翻译成英文，进而迅速渗透到北美文化意识中。在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之后，富恩特斯的《阿特米奥·克鲁斯之死》和略萨的《英雄时代》接踵而至，每一部作品都将我们日益增长的意识提升到一个新高度。

第一位登上畅销书排行榜的拉美裔美国作家也正出现在此时：理查德·罗德里格斯。罗德里格斯的作品无需翻译。他在1981年出版的意味深长的回忆录《记忆的饥饿》，文笔犀利而忧伤，是一部挑战对墨西哥裔美国人的成见的力作。三年后，西斯内罗斯推出了《芒果街小屋》。这部文笔简洁但感人肺腑的小说，描绘了芝加哥贫民区的一个7岁墨西哥女孩。作品让读者窥见到一个鲜为人知的美国。

到了90年代，对拉美裔美国文学的兴趣带来一片商机。在奥斯卡·希胡罗斯以古巴主题的激情小说《曼波王演奏爱之歌》荣获普利策奖之后，出版商争先恐后推出各种背景的拉美裔作家的作品。于是便有了朱莉娅·阿尔瓦雷斯叙述（纽约）布朗克斯区4个多米尼加姐妹成长故事的生动小说《卡西亚姑娘们不再带口音》；克里斯蒂娜·加西亚描绘她在迈阿密的移民家庭的清新明快的《梦回古巴》；弗朗西斯科·戈德曼以危地马拉军统时期为背景的《白鸡的漫长夜》；埃斯梅拉达·圣地亚哥追忆梦幻童年的《我是波多黎各人的岁月》；以及朱诺特·迪亚斯描写多米尼加裔街头无业青年严酷生活的短篇小说集《沉溺》。

我们的美国文化概念也在迅速转变。在《女勇士》出版后仅10年问世的谭恩美的

《喜福会》，开拓了亚裔美国文学创作的新时期。不久，便有李健孙的《华仔》，讲述身处旧金山街头残酷环境中的一个男孩的故事；邝丽莎（亦译冯丽莎）的古代中国历史小说《雪花与秘扇》；任碧莲的并非描写华人而是探讨身为美国公民的含义的《典型美国人》。如今，美国文学中的这一阵营更加壮大，其他亚裔背景的移民后代作家也步入其中，如：日裔作家山内若子、越裔作家吴辉明、韩裔作家李昌来，等等。

创作新的美国故事

美国对多元的浪漫钟情有增无减。今天，在多元背景的作家中，既有祖籍南亚的美国人，例如：约帕·拉西里(《病症翻译》)、马尼尔·苏里(《维斯奴之死》)和维克拉姆·钱德拉(《孟买恋欲》)；也有来自异域的非裔美国作家，例如：以海地为题材写作的埃德维奇·丹迪卡特以及出生于牙买加的纳罗·霍普金森。近年来，中东文化背景作家的作品正在不断涌现，如：哈立德·侯塞尼的《追风筝的人》、黛安娜·阿布-贾比尔的《新月》以及阿扎尔·纳菲西的《在德黑兰读洛丽塔》。

这些作家有哪些共同之处？回答是：弘扬祖先文化的意愿——永不忘却自己的根。与美国早期移民不同的是，他们在融入美国文化的同时保持着极强的族裔自豪感。

杜波依斯将此称之为"双重意识"，理查德·怀特则称之为"双重视野"。无论如何称谓，这个从黑人生活中诞生、由移民经历合成的新型文学，已无法再被视为异域文化。如今，这就是美国文学。

我自己是在后来，也就是在成为作家之后，才开始珍视自身的文化根源。在纽约图书出版界做了多年编辑的我，没感到有什么必要去思索我在秘鲁出生和身为半个秘鲁人的成长经历。我太专注于做一个地道的美国人、出版杰出作家的作品、面向"典型"读者，即美国人想读什么？

到了40多岁时，我来到《华盛顿邮报》工作，最初担任书评版副编辑，后来做了编辑。邮报编委深感美国拉美裔文化日渐声势，因此敦促我介绍这一趋势。一开始，我写了些有关拉美事务的评论，然后开始撰文谈移民群体、移民工人生活以及拉美裔美国人的心态情结。后来，我开始回顾10岁时初来美国的感受。90年代晚期，我潜心将自己在双重文化背景中的成长经历集写成书，此时，我这种经历已大有人在，外裔美国人已构成一个庞大、活跃的群体。

这种趋势是不可逆转的。正如汉弗莱恰如其分地指出，这是一个以多元而自豪的国度；我们因之而格外丰富多采：多元文学极具原创性、根触更为广阔的世界，同时又是地道的美国文化。朱诺·迪亚斯的小说杰作《奥斯卡·瓦奥短暂而奇妙的一生》探讨了多米尼加裔人的个性，但如果没有新泽西街头的生活是无以完笔的。爱德薇芝·丹蒂凯特那动人心弦的海地回忆录《兄弟，我已不久人世》，若没有她举家迁徙纽约市的经历，是不可能问世的。这些先驱作家是在通过追根溯源而带出一个新美国。一只脚仍远滞异邦，另一只脚则稳落美国。

处于十字路口的文学

塔亚莉·琼斯

塔亚莉·琼斯（Tayari Jones）是佐治亚州亚特兰大人，擅长描写南方城市的生活。她的第一部小说《离开亚特兰大》（Leaving Atlanta）（2002 年）获得赫斯特/怀特小说新人奖（Hurston/Wright Award for Debut Fiction），被《亚特兰大宪章报》（Atlanta Journal-Constitution）和《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评为年度最佳小说之一。她的第二部小说《无以言说》（The Untelling）（2005 年）获得莉莲·C·史密斯新声奖（Lillian C. Smith Award for New Voices）。她曾得过雅窦（Yaddo）、麦克道尔艺术村（MacDowell Colony）和布雷德洛夫作家创作班（Bread Loaf Writer's Conference）等声望很高的奖学金，现任新泽西纽瓦克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硕士艺术专业助理教授。

如果走进美国的一家大型连锁书店，你会在写着“非裔美国人作品”（African-American Interest）的书架上找到我的书。每隔几个月，我便会收到一封来自愤怒读者（通常是白人）的电子邮件，对于她认为我的作品遭到的诋毁感到愤忾。“你的作品应当和所有普通作者的书一起放在书店的前方！”她说的“普通”一词是指白人，但她甚至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也收到过年轻黑人作家的讯息，他们对于自己甚至还没下笔的书的地位揣揣不安，提前担心“怎样让我的书不在黑人书架上销售？”我自己的创意写作班上的学生在上过几星期的课之后，鼓起勇气问我对于我的小说 “被吉姆·克罗”（“Jim Crowed”， 指《民权法案》[Civil Rights Act]颁布之前实际实行的种族歧视）有何感想。和其他许多人一样，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我的作品被放在离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和乔伊斯·卡罗尔·奥茨（Joyce Carol Oates）等美国大家的类似作品将近 10 英尺开外的书架上出售，而我却不特别感到烦恼。有些读者大声发问，在这个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时代，书店怎有胆量突出作者的种族出身并以此安排书架。一位好意的读者甚至提议代我写信给书店老板。虽然我受到感动，但劝她冷静下来。我可不希望只为了成为不带区别的“作家”甚或“美国作家”，而甩掉“黑人作家”的标签，因为这个特别称谓让我的生活饶富趣味。

我和同侪不同，我对标签感到兴味盎然。就我而言，标签越多越好。塔亚莉·琼斯是非裔美国女性，南方人，中产阶级，惯用右手的作家。她是自己家族的作家。她是穿绿毛衫、早餐吃焦糖布丁的作家。只要形容之词真实，并且允许我尽情挑选，我就不介意用形容词界定我的身份。标签的麻烦不在于标签本身，而是一些读者对这些标签的反应。传统上标签被用来指明较低下的地位。然而，单纯地回避标签，并不能解决让标签出现的种姓制度。反之，避开“非裔美国作家”标签实际上可能再招致让人痛苦的假设。人们有时说“你的作品太好了，不能放在书店的‘黑人’架上！”理由似乎是区别黑人和其他人种作品的因素是优质。这种善心的读者力求把我从种族主义中营救出来，却不去攻击这头恶兽本身。

甚至在我书写的当儿，即使我对所写的内容深有同感，这个问题也有点不着边际。情况似乎是，如果不触及非裔美国作家被人读意味着什么，或者更甚之，作为非裔美国作家被推销意味着什么的问题，就无法回答作为非裔美国作家的任何问题。我内心的艺术家对这个问题感到烦恼，因为它实际上无关乎我用纸笔写就的作品。

写作本身是借助想象力的精神劳动。纸笔相伴时，我不会想到大型连锁书店的上架安排，也不会考虑书评家选用的措辞。我写第一部小说《离开亚特兰大》时，写作的动力是渴望讲述在 1979 到 1981 年的儿童谋杀案期间，亚特兰大非裔儿童生活及死亡的故事。这部小说记录某时某地某代人的情感历史——它的价值主要在于这一功能。虽然那个恐怖时代的事件现在被视为历史，但对我而言，它更像是记忆而非历史。1979 年时，我是个 10 岁的女孩，牙齿过大，朋友不多。到我 12 岁时，我的五年级班上有两个男生死去，还有十几具男孩尸体散布在我的家乡——“忙得没时间仇恨的城市”中。在这个恐怖背景下长大成人的经历，让我明白作为黑人的代价。当我坐下来写出我称之为宝贝的第一部小说时，感觉这是讲述真相的要紧事，而不是“填补历史空隙”的学术任务，而后者往往被视为非裔美国作家的“工作”。

尽管我的确赞赏作家运用想象力在小说中呈现过往世代失去的声音，但我认为非裔美国作家也必须拥抱当代的经历。虽然非裔美国作家精湛地重构了过去，比如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饶富才气的《宠儿》（Beloved），但是我们不能受困于填补不全面的历史记载所留下的空白，而不留下我们自己有意义的生命记录。我不希望因为我耗尽资源和天分沉思过去，而使我的孙女被迫依赖图书馆档案重构我的生活。在一定时候，严肃的作家必须自己积极致力于把我们自己的体验转化为艺术。

* * * *

将体验转化为艺术，将观察转化为艺术，将情感转化为艺术，甚至将构想转化为艺术，正是作家的魔力所在。这种魔力出现在心与脑之间。或许受感召的位置是喉咙，从这里发出声音。

我的所有小说背景都是佐治亚州亚特兰大——我的家乡。我最喜欢把作品的环境设在美国南方的城市中心。我爱这些地方，因为在其中旧世界碰上了新技术，种族、阶级、性别和政治的门柱经常在夜里移转，以至于我的人物一早醒来时，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必须在剩下的小说篇幅里寻觅。我的人物和我在一起做这件事。我们一直在寻找真相。我们都明白，真相是普世的。

我在这篇随笔中似乎自相矛盾，这是可能的。起初，我在讲述作为非裔美国人经历的特殊性。我甚至认可美国书店的单独分区。但是区区几段之后，我便抽象地大谈艺术的普世性和超越。

对我而言，这些想法并不矛盾。它们是相交的。在海外非洲人的众多传统中，十字路口是圣地，现世和精神世界在此交汇。我认为非裔美国文学这门艺术在两条道路的交叉口找到它的家园。非裔美国作家身在有形世界中，讲述我们才华横溢的多元民族的现实。我们阐释这个有形现实世界的方式，和我们的面孔一样多彩多姿。非裔美国文学没有地道的现实标记，但是有地道的见证——由作家和她的良心所确定。然而，在精神之路上有作为我们人类共同纽带的东西，它比我们建构的现实更重要。

让我们回到这个故事的起点来结束这个故事，回到设立分区的书店。对于发现我的书被放在他们认为的“非普通”区域而感到沮丧的朋友和读者，我鼓励你们更加审慎。书架上指明我的小说以及我的关于爱、家庭和住宅的人间故事的标志，并没有声称它们“非正规”。这个标志只不过提醒购书人我是非裔美国人，我的作品源自某个丰富的历史传统。它在邀请人们体验这些多种多样，但紧密相连的艺术作品所描述的人性。我不认为真相在任何时候会是艺术的敌人，挂在那里的标志说明着一个错纵复杂但毫不含糊的真相。当你站在有标志的书架前面时，你便处在那个不可思议的神秘十字路口。你有同时感受这两者的勇气吗？无论你对直率的作者种族背景介绍作出何种情感反应，都代表你在那实在的现实道路上的立足，但你有勇气体验其他的，更多的人类情怀吗？非裔美国文学和所有文学一样，是所有民族的精神食粮。你能认可这个标签，并走过来接受它同时并存的相关性和非相关性吗？同时走在两条路上很难，但是你能做到。我相信你会这么做。你只需要承认心灵的饥渴，而饥渴表达着人性的最大需要。

狗精灵：或曰，我的小说处女作诞生记

兰德尔·凯南

兰德尔·凯南（Randall Kenan)广受好评的作品包括《精灵的探访》(A Visitation of Spirits)(1989年）和《让死者埋葬死者》(Let the Dead Bury the Dead)（1992年）。他周游美国数年，采访了各行各业的非洲裔美国人，写出了《二十一世纪之交的美国黑人生活》(Black American Lives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2000年）。他的近作《这一次烈火》(The Fire This Time)（2007年）成为对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美国黑人作家<1924-1987>，著有著名短文集《下一次将是烈火》<The Fire Next Time>——译注)恰逢其时的纪念。凯南在位于查珀尔希尔（Chapel Hill)的北卡罗来纳大学（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教授创意写作。

一.

我从来没亲眼见过狗精灵，但这不妨碍我能见到它。有人说，它其实是一只灰狼，红眼睛熠熠闪烁。有人说这是一只巨大的“sooner”（南方对杂交狗或杂种狗的称谓，意为“既可说它像这个种，也可毫不迟疑地说它像那个种”）。但在关于狗精灵的目击者的报道里，人们说，它是白色的，幽灵般地白，常常形似一只牧羊犬，有着敏锐的鼻子和尖尖的耳朵的那种。高贵。坚毅。

在孩提时听到的每一个故事里，这狗总是乐于助人：我的曾姨祖母讲起过，这狗有一次曾在她迷路时领她走出森林。甚至还有一个很长的故事，讲的是我的高曾祖母，一场风暴，一头骡子，一架抛锚的大车和这只英勇的狗精灵。一位妇人曾讲道，她受到一群野狗的袭击，这条美丽的白狗是如何腾空而出、窜过来救了她，并护送她安全回家。而当她站在门口回头张望时，这只狗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有关目击这狗的事情总是发生在一条沥青公路的某一地段——这条公路过去是美国原住民使用的小道，当时是一条土路，到了我小时候，它变成一条通往海滩的主要道路。50号公路横穿一片惊人的古木森林。橡树。杨树。松树。特别那些雄伟、挺拔、枝干硕大、最近变成濒危物种的长叶松。对小时候的我来说，这片森林是原始的、充满了神秘、险恶，到处是巫师和小妖精以及我在格林童话中看到的各色奇迹。还有那条只令人惊异的白狗。我从未看到过的那只狗。但它活在我的想象之中。迄今犹在。

在今天看来，我会写这狗精灵和北卡罗来纳州东南部的世界是合情合理，自然而然的。杜普林县(Duplin County)。青克平（Chinquapin)。一个只有几百人的小镇。大多是农民、家禽工厂工人和陆战队基地的工人。但是，这些看似的必然当时对我并不是这么明显。

二.

我第一次离开我那鬼神骚扰的北卡罗来纳州小镇，是到位于查珀尔希尔的北卡罗来纳大学读书。这是全国最古老的公立大学，是古典思想、进步的社会思想、高雅艺术和当时对我最重要的——科学思想的重镇。我那时的目标是成为一个物理学家。我对科学的兴趣源于令我几小时流连忘返的太空剧，像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的《基地》（Foundation)，弗兰克·赫伯特(Frank Herbert)的《沙丘》（Dune)，《星际旅行》（Star Trek)和对于外星文化、超光速旅行、黑洞、虫洞和冷射线枪的幻想。（我永远不会忘记大学三年级时我的物理专业导师对我说的话："我觉得你真应要当一名科幻小说作家，我的小伙子。"我有些不爽，当极力想辩解我在微积分课得的 C 时，他立刻对我说："当作家绝不丢人。"他说："如果有可能的话，更多的科学家会成为作家。"他对我说："所以，你能当，是三生有幸。"）

坦白地说，我对科幻小说的兴趣促使我去学了创意写作，学习写作又导致我去研究文学。但是，我们说的是那种富丽堂皇的典范文学，像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和司各特·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和威廉·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在很早的时候我就认识到这里有一种文学正统。身在美国南部，并在美国南部首屈一指的大学里，南方文学便至尊无上：托马斯·沃尔夫（Thomas Wolfe)。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弗兰纳里·奥康纳(Flannery O'Connor)。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尤多拉·韦尔蒂(Eudora Welty)。南方文学意味着社会现实主义。这些都是树立在我们这些踌躇满志的南部年轻作家面前的偶像。任何魂灵幻象的色彩都不受欢迎，甚至受到嘲讽。真正的作家、好的作家写真实的世界。"写你知道的"是英语系视为掌上明珠的创作课的口头禅，而我的专业，到四年级时，已不再是物理，是英文。我在写我所熟悉的。我听人说过狗精灵。

三.

青克平那里的十样东西：

1. 大豆田
2. 两座黑人浸信会教堂
3. 响尾蛇
4. 火鸡饲养场
5. 黄瓜地
6. 鹿
7. 夏日家庭团聚
8. 烟草棚
9. 九月复兴聚会
10. 棉口蛇

四.

我在 1981 年秋天来到查珀尔希尔时，非洲裔美国人所占的比例还只有一位数，大约在 4%至 5%，但那区区几百人却让那数千人确确实实地感觉到了他们的存在。不管是什么原因，我最亲密的朋友大多是非洲裔同胞，是出于对所熟悉东西的需要吗？是一种归属感吗？还是在同类人当中的自在？ 毫无疑问，我有许多要好的关系亲密的白人朋友——以及日本人、拉美人和印度人朋友，而且跟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我仍保持着良好关系——但非裔美国人的文化引力总把我牢牢吸住，我为黑人学生报纸写文章，我在黑人学生运动福音唱诗班（Black Student Movement Gospel Choir）里唱歌。

当时，我从未真正感受到“写黑人”的压力，我极为尊重社会现实主义信条（Gospel of Social Realism）及其准则，我对它相当熟悉。但是我在创作室每递交一个自传故事，都会再写一个以根巫（root worker，非裔美国人的民间巫师）为主人公或以一个太空站或一只会讲话的狗为主题的故事。而且，到那时候，我已经遇见了三位作家，他们给了我我愿称之为的“写作许可”。

任何一位作家所能获得的最好训练就是阅读，阅读，更多阅读。这也是最根本的，甚至比写作本身更重要。虽然我酣畅地饱览了上述南方典范作家的作品，其中也夹杂着对伟大的非裔美国人小说（Great African-American Book of Fiction）的大量涉猎——如拉尔夫·埃利森（Ralph Ellison）、詹姆斯·鲍德温和格温德琳·布鲁克斯（Gwendolyn Brooks）等人的作品，但是偶而我还会碰上在那些花园墙外的作品，而这些作家对于我如何看待散文小说产生了重大影响。伊萨克·辛格（Issac Bashevis Singer）。三岛由纪夫（Yukio Mishima）。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这些作家，乍看起来，并不会显然成为一个来自北卡罗来纳州东南部农村的年轻黑人心目中的英雄。

是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当时她已经出名，不过仍在《宠儿》（Beloved）问世和她获得普利策奖（Pulitzer Prize）和诺贝尔奖（Nobel）的前数年——教给我一些具有开窍意义的东西。除了少数人以外，非裔美国人的文学作品多归于“反抗”文学，即追溯至 19 世纪的层出不穷的著名奴隶故事。甚至直到 1970 年，即莫里森的第一部小说问世的那年，大多数重要的非裔美国人作家的小说仍大多以黑人的民权和社会公正为主题。但莫里森的主题却是黑人自身，而不是种族主义或者政治。她选择将着眼点落在个人和家庭关系上，揭示人性与灵魂。在她的笔下，可能洋洋数百页中毫无涉及白人观点的东西。这对于我这个 18 岁的头脑是一个启迪。

哥伦比亚大作家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的作品把我引入了广为人知的魔幻现实主义。我由此而脱胎换骨。（在接受诺贝尔奖的演讲中，马尔克斯强调在他的作品中毫无奇异怪诞之处，他笔下的世界是完全真实的。我当即就完全明白他的意思。）这位作家在以就事论事的社会现实主义的同一种语言描写精灵和全镇人的集体失忆，描写蝴蝶风暴和女人们飞往天堂 ——而且，他最喜欢的三位作家是福克纳，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和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

当我上大学时，佐拉·尼尔·赫斯顿（Zora Neale Hurston）被忽略已久的作品才刚开始重被发现，它们像中子弹一样击中了我。这是一位训练有素的人类学家，一个佛罗里达州人，一位非裔美国人，她把民间传说和百姓生活、社会现实和奇思异想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如同莫里森一样——莫里森受赫斯顿很大影响，赫斯顿并没有把种族政治置于黑人文化的存在实质之上。

《所罗门之歌》（Song of Solomon）。《百年孤独》（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他们的眼睛看着上帝》（Their Eyes Were Watching God）。仿佛这些作品都在发出同样的声音：尽管去写吧，小伙子，走你自己的路。

在我的得奖论文中，我写出了构思中的小说的几个篇章。小说的场景是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像青克平那样的小镇，叫蒂姆斯溪（Tims Creek），主要人物是一位律师，他出生在那个小镇，后来成了首都华盛顿的一位很成功的律师。然而，在一个命中注定的夏天，当他在某种情感纠结乱作一团的状态下回到蒂姆斯溪时，他碰上了一位根巫，并受到了这位巫师的诅咒（祝福？），然后，第二天晚上，在满月之下，他变成了狼人！我把这篇小说定名为《灰烬不燃》（Ashes Don’t Burn）。

可怜，可怜，我。

五.

想象一下，大学毕业的第一份工作是为你的两个文学偶像的出版社做事会是什么感觉。艾尔弗雷德·A·克诺夫（Alfred A. Knopf）。纽约市。托妮·莫里森多年的出版商。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新出版商。1985 年。我不久将成为《霍乱时期的爱情》（Love in the Time of Cholera）作者的编辑的助手。对于一个踌躇满志的作家来说，这犹如在梅林（Merlin）脚下学习。

不过，另一个教育机会也出现在我生活里：我到皇后区和布鲁克林区（均属纽约市——译注）生活了几年，每天在地铁里、街道上、商店内，最后在人们家里，与海外非洲人群体中的各方黑人摩肩擦踵。我结识了来自加纳、特立尼达、海地、多伦多和得克萨斯州休斯顿的黑人。这些接触对所有那些界定黑人的根深蒂固的观念提出挑战，使我以崭新的眼光回视我当年成长的世界。霎时间，炸鱼片、走调的教堂唱诗班、顶着太阳在烟草田间辛苦劳作的时光、假期圣经学校、宰猪，以及各种狗精灵的故事不知怎么都变得重要了，重要得要被写出来。

《灰烬不燃》有一个根本的缺陷。回头看，我感谢充满社会现实主义的北卡罗来纳大学的教师帮助我认识到那个路障。那个障碍与变狼巫术完全无关。简单地说：我不是一个在回乡后经历了危机的 30 多岁的律师。我所写的不是我的“所知”。但我过去也是那个同样家庭里的孩子。因此，渐渐地，我一直在努力创作的故事改变了。我保留了那些肯定是住在幽暗森林中的超自然人物。而书中的景象丝毫没变，而且其实大概更加丰富和深

化了，部分是因为我对它的怀旧——作为对那个 60 亿只脚下的城市的反应，对森林、野鹿和玉米地的梦怀。

我在夜晚、在地铁、在周末不停书写的故事最终在 1989 年夏天以《精灵的探访》为名出版。有意思的是，书中没有狗精灵.但有许多其它精灵和动物，天地之灵和心智之灵，它们与我得到严格培养并令我极欣赏和尊重的社会现实主义——适度地交织在一起。

现在，对我来说，这似乎是一条必行之路。对。我的唯一可走的路。然而，通向那个虚构远景的道路既非笔直，也非一蹴而就；但是每一曲折、每一弯道和每一死胡同都是值得的经历。

我希望在不远的一天回到狼人的故事。那个神话中有某种东西与蒂姆斯溪、与青克平十分相称。当然，很快而且非常快，我希望一个狗精灵会显现在我的故事中。它腾然而出，竭尽解救之力，而后却再次消失在想象中。

从卢旺达到美国：通过写作达到超越

伊马丘蕾·伊利巴吉萨

伊马丘蕾·伊利巴吉萨(Immaculée Ilibagiza)1998 年移民到美国。她的第一本书《宽恕——我唯一能做的：种族灭绝的幸存者告白》（Left to Tell）（2006 年）讲述了她在卢旺达种族灭绝期间的经历。她最新的作品是《信仰指引我们》（Led by Faith）（2008 年）。她从事宣扬和平、信仰和宽恕的演讲活动。

我一直热爱写作。童年时期我最宝贵的财富就是我多年来收集整理的一本警句格言。尽管如此，我从未梦想过有人会阅读我在笔记本中倾诉的秘密。每个人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故事，但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向全世界讲述他们的故事。

我在 1994 年的经历使我产生了一种难以遏制的愿望：我要和世界各地的人民分享我的故事。那年复活节，学校放假一周，我回家过节。返校前两天，我发现自己陷入了一场世界历史上最迅猛、最血腥的种族灭绝。4 月 7 日上午，哈比亚里马纳（Habyarimana）总统的飞机被击落，种族大屠杀由此开始。

我做老师的父母同意了哥哥让我出去躲躲的建议。我们家有三个男孩，我是唯一的女孩。我拒绝躲藏，我的两个哥哥和父母却一致坚持。幸运的是，我哥哥艾马布勒（Aimable）当时正在塞内加尔求学，所以我们都知道他是安全的。

出于对父母的尊敬和顺从，我违心地到附近的一位路德会牧师家里躲藏，他是胡图（Hutu）人。我是图西（Tutsi）人，被屠杀的正是我的族人。我一到那位牧师家就被他藏进了一个一平米半的浴室里，里面还有另外五名妇女，后来又有两名妇女藏了进来。

牧师吩咐我们保持安静，并向我们保证他不会告诉任何人，包括与他同住在这所房子里的孩子们；我们就在他们的鼻子底下藏身。他告诉我们战事可能会持续几天，但肯定不超过一周。但是，三个月过去了，我们仍然躲在那间狭小的浴室里，一言不发地坐着，生怕被人发现。在那段时间里，我们只得到很少的食物，这座房子也多次遭到搜查。

等我们从浴室中出来的时候，我们这个小国已经有 100 万人蒙难，死尸遍地。那天晚上，我发现全家人都被残忍地杀害了。我一直在想，这一切只是一场噩梦、到点就会醒来，但悲哀地是我生活在新的现实里。这个现实可怕得就像我曾想象过的世界末日。

躲在浴室的那段时间，我经历了身心的巨大变化。我的体重下降到只有 65 磅，但我的信念却坚如磐石。我一直记得那一刻，我祈求上帝让我把我的故事和我在这段暗无天日的日子里得到的感悟告诉整个世界。

我渴望向世界讲述我内心和我的国家发生的变化，我无法无视这一渴望。然而从文化上来说，卢旺达人通常不写书。我的祖国有时被称为“言语之国”。我国人民的传统习

俗是在家庭聚会上口口相传我们的新闻和历史。可是现在不会再有人传承我们的故事，因为我的家人和邻居都遇害了。

我从没想过我能写一些别人愿意阅读的东西，然而这个念头挥之不去。我无从思考怎样圆我用笔讲述故事的梦想，我对写作一无所知，我也从没遇到过任何作家。但是，我对上帝的信仰让我知道任何梦想都有可能实现。我的信念让我一直保持着希望。

卢旺达难民我渴望与他人分享我父母的故事和他们教给我的智慧——一直到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们的那天。他们智慧的话语引导我成长到今天。我不知道在不能再和他们说话、不能再取得他们忠告的情况下我将如何生活下去。我知道他们的话语和记忆会永远伴陪着我，但我想告诉人们我美好的家庭是怎样破碎的。

在浴室里躲藏时，我的心态从对屠杀者的愤怒和仇恨慢慢变成了宽恕。我幻想杀死那些捕杀我和我亲人的刽子手，这种幻想让我体会到愤怒的痛苦。我的愤怒就像我心灵的毒药。仇恨数百万人是一种太过沉重、太过痛苦的负担。邪恶和仇恨似乎让我透不过气来，直到我乞求上帝指引我怎样发现人性中的善良、怎样去爱、怎样微笑。

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刻，我的心摆脱了愤怒。当我试图用语言表达那一刻的感受时，我唯一想到的字词就是“宽恕”。如果我们不是在躲避追杀，我会因为喜悦对浴室中的难友们大叫他们是多么美丽，虽然在现实中我们全都瘦得皮包骨，而且几个月没洗过澡。我认识到刽子手们真地是被愤怒和仇恨蒙蔽了。我认识我改变不了他们的内心，竞相仇恨对方将无济于事。

宽恕并不意味着我应当把自己变成受害者，听任别人伤害我，也不意味着我应该忽略真相或天真懵懂。如果正义的目的是改变一个人而不是伤害或复仇，正义也是一种宽恕。我牢牢记着这些感悟，我凭直觉知道，它们不属于我一个人，我应当与他人分享，但还是那个问题：我该怎样分享这个故事？

1998 年底，种族灭绝的凶徒们威胁要杀了我，就像他们杀掉许多其他幸存者一样，因为见证了那场大屠杀的人们对他们构成威胁。我愿意作证，但实际上我没有告发任何行凶者。我没有亲眼见证杀戮，我知道那些捕杀我的人一定屠杀了许多其他的人，我相信他们会受到审判。我和许多其他幸存者一样到监狱里探视面视那些杀害我族人的人。我遇到一个杀害了我数位亲人的凶手，我给予他宽恕。我知道我不会成为好的证人，但即使如此，那次探视后不久我的名字还是出现在报纸上。我被称作把无辜者关进监狱的证人。

认识到自己的危险处境之后，我接受了美国朋友的建议，决定离开我在卢旺达的家，移民到美国。当时我在卢旺达为联合国工作，是国内最好的工作之一，但我知道我必须移民。

我坚信移民到美国是上帝的启示。但我初到美国的几个月过得并不容易。我发现自己生活在完全陌生的文化中，难以融入新的环境。我以前从没经历过冬天，而我抵达美国时恰逢冬季开始。更糟的是，我怀着我生命中的第一个孩子。

我第一次经历短暂的白天和漫长的夜晚，反过来也一样。在卢旺达，气温全年都在 18 到 21 摄氏度之间。太阳每天都在下午 6 点落下，早晨 5 点升起。基加利和纽约的差别犹如白天和黑夜。这两个城市几乎没有任何相似之处。

虽然我不得不作出许多新的调整，但我强烈地感觉到，我生来就该在美国生活。这是一个令所有种族和部落感到轻松自在的国度。我观察周围的人，在每一张脸上看到显而易见的自由。我几乎能在空气中闻到自由的气息。人们穿着自己喜欢的衣服，做自己喜欢的事，似乎没人会为任何事而惊讶。这里有数不清的学校和机会。我可以尝试我喜欢的所有课程或工作。纽约似乎是世界的中心。这里有我前所未见的多种多样的服饰、汽车和人种。

人们的热情和乐于助人非常令人意外。我永远不会忘记我那次爆胎的情景。我一直没有意识到我的车胎爆了，直到一辆汽车超过我把我拦下，迫使我停下来。两个身穿白色 T 恤衫的男孩面带微笑地拿着工具下车，修好了我的汽车。他们修好了我的车，给了我一个轮胎，留给我一个温暖的微笑。直到今天我仍然在想，那些孩子是来自天堂的天使还是凡人。

一段时间之后，我感到一种难以遏制的愿望：我想把我的故事写出来。我用了三周时间完成初稿。一段时间之后我重新审视我的作品，又用了三个月时间修改我的初稿，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有工作，我尽量兼顾改稿和工作。了解我的经历的美国朋友都鼓励我写作。

完成写作三天之后，我到纽约参加一场专题研讨会。我只把它当成一次与友人相聚的机会。研讨会结束时，我遇到一位作家，他问我过得怎么样。我答，“挺好”，而就这一句话，他便问起我的口音来自哪里。我告诉他我来自卢旺达。他听说之后睁大双眼问我，“你知道那里发生的事吗？”我简短地告诉他那里发生的变故。我们都很匆忙。他正在签名售书，我不想妨碍后面的人。然后他告诉我，如果我的书已经写完，他愿意帮我找一家出版商。这次见面之后不久，他果然信守承诺把我引荐给他的出版商和一位编辑。我们初次见面八个月后，我的第一本书《宽恕——我唯一能做的：种族灭绝的幸存者告白》出版了。令我大为意外的是，它发行短短两周之后就登上了《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畅销书排行榜。

我感激美国人民用开放的胸怀接纳了我的故事。我不知美国人会怎样将他们自己与那样的恐怖联系起来。但他们的确联系起来。他们为我的父母哭泣，和我一起欢笑，与我对信仰的挣扎有同感。讲述我的故事让我心灵的创伤得以逐渐愈合。

我在美国建立了自己的家，找到了哭泣时可以依靠的肩膀。我的孩子们是美国人，我为他们骄傲。我不再觉得自己是陌生人。我为新家园的每一个胜利而欢呼，每一个坏消息而落泪。最重要的是，我对这个国家的未来满怀希望，我为它的平安而祈祷。作为一个在卢旺达小村庄玛塔巴（Mataba）长大的小女孩，我得到的教导是美国是一个充满机遇的国度。现在我比以前更相信这一点。在美国我可以讲述自己的故事。

什么是美国黑人文学？

杰拉尔德·厄尔利

一种新的黑人粗俗小说的出现可能标志着美国黑人文学的成熟，而非衰落。

杰拉尔德·厄尔利（Gerald Early)是位于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梅尔克灵（Merle Kling）现代文学杰出教授，在那里主持学校的人文中心。他的专长是美国文学、1940 年至 1960 年间的美国黑人文化、美国黑人自传、纪实散文和通俗文化。厄尔利曾著有多部书，包括获奖作品《瘀伤文化：职业拳击赛，文学和现代美国文化散文集》（1994 年）。他曾编辑了许多文选，还为肯·伯恩斯（Ken Burns)关于棒球和爵士乐的纪录片担任顾问。

美国黑人作家尼克·奇莱斯（Nick Chiles)曾在《纽约时报》舆论版颇有争议的一篇文章中鞭笞了出版业、年轻的女性黑人读者以及美国黑人文学现状。这篇题为“满目糟粕”(Their Eyes Were Reading Smut)的文章使他名传遐迩。（该文的标题显然是对左拉·赫斯顿（Zora Neale Hurston)1937 年的经典小说《瞩目上帝》（Their Eyes Were Watching God)的诙谐套用。这部小说是美国黑人文学中女权主义的顶尖作品，被许多学者视为同期伟大的美国小说之一。）虽然奇莱斯很为像“Borders”这样的主流书店为“美国黑人文学”辟出很大的陈列空间而高兴，但又为书店和出版业给“美国黑人文学”下的定义而困惑不解。他写到：“[所有]我能看到的都是俗艳的书籍封面，描绘着各种形式的棕色肉体，通常是半裸，摆出撩人的姿势，往往伴随以枪枝和其他罪犯生活的象征物。”这些小说的名字有《地沟》(Gutter)、《瘾君子》(Crack Head)、《永为皮条客之妻》(Forever a Hustler's Wife)、《皮条客之子》(A Hustler's Son)、《与贼相伴》(Among Thieves)、《割喉》(Cut Throat)，《地狱剃刀宝贝们》(Hell Razor Honeys)、《以命相抵》(Payback with Ya Life)等等。著名的作家有关（K'wan)、罗纳德·昆西(Ronald Quincy)、昆汀·卡特(Quentin Carter)、德嘉·金(Deja King)（又称享乐王）、泰瑞·伍兹(Teri Woods)、维基·斯特林格(Vickie Stringer)和卡尔·韦伯(Carl Weber)。这些作品构成了一个所谓现实主义的流派，叫做城市贫民小说或嘻哈小说，描写贫民区的生活，充满赤裸裸的性爱、毒品和犯罪，包括“普拉亚斯”的暴徒、小开（有钱的毒贩）、残忍的暴力，其中挥霍无度与贫困户公寓的艰辛生活并存。在某些情况下，小说只不过是出自罪犯之口的黑色犯罪小说，其他小说便是置于贫民窟里的黑色爱情小说。不管怎麽说，它们都是一种粗俗小说，尽管他们自称现实主义，实际上他们描写的都是幻想，因为他们的读者在试图理解现实的同时又试图逃脱它。总体而言，妇女占美国小说读者的多数，而上述作品的读者大部分是女性黑人青少年。这些书籍专门向这个客户群推销。其中的一些小说销量斐然，足以维持一些作家的温饱，而不必“上班”，这种情况在作家中实属罕见。

这些书的存在说明了美国黑人文学过去 30 年或 40 年以来在三个方面的嬗变。首先，尽管美国黑人文盲率和高中辍学率很高，但仍有一个年轻的、数目很大的黑人读者群，其数量达到可以让黑人作家专门为其写作，而不需顾忌其高雅与否或文学性或是否需

要白人读者捧场。第二，人民群众的品味有别于精英品味也让精英们感到不安，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精英再不能控制美国黑人文学的方向和目的；文学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受市场的左右，而不是像以前那样是由受过教育的白人和黑人光顾和培养的一种艺术形式。黑人开创了“都市书丛 ”（Urban Books)和“三冠王”(Triple Crown)两家出版社即证明了这类种族文学的商业可行性和民粹主义的性质：来自黑人，用于黑人。第三，美国黑人文学已不必再像以前那样反映或鼓动政治抗议或对本民族人性的特别呼唤，或试图建立历史和文化价值。（这并不意味着美国黑人文学抛弃了这些主题，最明显的例证是黑人儿童和青少年文学，它们经常像人们所预料的那样充满说教。）这并不是说奇莱斯所痛惜的那些书籍有一些新文学或外文学的价值，可以补偿那些粗俗的内容和拙劣的写作技法。但这些书确实揭示了美国黑人文学和美国黑人读者群的复杂渊源。

20 世纪 70 年代初选用黑人演员的电影——如梅尔文·范·皮布尔斯（Melvin Van Peebles)独立制作的经典《甜甜背的坏蛋之歌》（Sweet， Sweetback’s Badass Song)；帕姆·格里尔(Pam Grier)主演的《考菲》（Coffy)、《狐媚布朗》(Foxy Brown)和《西芭，宝贝》(Sheba, Baby)；弗雷德·威廉森(Fred Williamson)主演的《哈莱姆地狱》(Hell Up in Harlem）、《黑凯撒》（Black Ceasar）、《博尔特那男人》（That Man Bolt）和《黑鬼查理传奇》(The Legend of Nigger Charley)；理查德·朗德特里（Richard Roundtree)主演的《贩毒者》（Superfly)；《侦探夏福特》(Shaft)系列电影——为反映硬汉和贫民区黑人生活、看似现实主义的艺术创造了第一个年轻的黑人观众群，其中心内容是拉皮条、贩毒、卖淫、反白人政治（其中白人——特别是黑帮和警察——力图破坏黑人社区）。这种形式的文学根基来自于上世纪 60 年代的两个流派。那种高雅、主流文学和左翼的流派推崇一些非小说，如《马尔科姆 X 自传》(Autobiography of Malcolm X)；埃尔德里奇·克里佛（Eldridge Cleaver)的文集《冰上之灵》(Soul on Ice)；囚犯和诗人艾瑟里奇·奈特（Etheridge Knight)合编的《狱中诗集》(Poems from Prison)，其中奈特的《祖先印象》(Ideas of Ancestry)是上世纪 60 年代最著名和最受推崇的美国黑人诗歌之一； 《索莱达兄弟：乔治·杰克逊的狱中书简》(Soledad Brother: The Prison Letters of George Jackson)。这些书籍都成为黑人文学经典的一部分，经常被用作大学的文学、创意写作和社会学的教学内容。20 世纪 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初粗俗的民粹主义小说里有皮条客出身的“瘦冰山”（Iceberg Slim) 和因吸毒入狱的唐纳德·高尼斯(Donald Goines)写的小说，包括《诡计宝贝》(Trick Baby)、《嗜毒鬼》(Dopefiend)、《街头球员》（Street Players）和《黑帮》(Black Gangster)。这些小说都是让奇莱斯在 2006 年感到沮丧的那些作品的直接楷模。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黑人文学中，这些小说是很少一部分，却不容忽视。许多人当时从政治角度来加以评价，现在此类书籍则充斥了美国黑人文学，或似乎如此。当时和现在一样，许多黑人（包括穷人、工薪阶层或跻身中产阶层的知识分子）——甚至许多白人——都有一种强烈的信念，认为暴力和贫民区文学反映了“真正的”黑人经历，是一种名副其实、政治上充满活力的“反抗”文化。

奇莱斯可能更愿意看到 Borders 和其他书店不把这些贫民区小说或嘻哈小说归入“黑人文学”类别。对公众来说，把这些书称为“非洲裔通俗文学”（Afro-Pop

Literature）或“贫民区黑人小说”（Black Urban Fiction）或“畅销黑人小说”（Mass-Market Black Fiction）也许更加合适。这样的话，“黑人文学”这一名目就能保留给那些名符其实的书籍和作家：从 19 世纪后期和 20 世纪早期的作家查尔斯·切斯纳特（Charles Chesnutt） 、诗人兼小说家保尔·邓巴（Paul Laurence Dunbar） 、小说家兼诗人詹姆斯·约翰逊（James Weldon Johnson）至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早期哈莱姆文艺复兴(The Harlem Renaissance)的人物，诸如：诗人兼小说家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小说家兼诗人克劳德·麦凯（Claude McKay）、小说家杰西·福西特（Jessie Fauset）和内勒·拉森（Nella Larsen）、诗人兼小说家康蒂·卡伦（Countee Cullen） ；还有 20 世纪 40 年代至 60 年代超越读者群限制的伟大人物：小说家兼散文家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长篇与短篇小说家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小说家兼散文家拉尔夫·埃利森（Ralph Ellison）、小说家安·佩特里（Ann Petry）、诗人兼小说家格温德琳·布鲁克斯（Gwendolyn Brooks）、小说家约翰·威廉斯（John A. Williams）；以及下列黑人艺术时代的作家：诗人兼儿童文学作家尼基·乔瓦尼（Nikki Giovanni）、诗人兼剧作家和小说家阿米里·巴拉卡（Amiri Baraka）、诗人哈基·馬德胡布提（Haki R. Madhubuti）[原名唐·李 (Don L. Lee)]；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的小说家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艾丽丝·沃克（Alice Walker）、格洛丽亚·内勒（Gloria Naylor）、沃尔特·莫斯利（Walter Mosley）、科尔逊·怀特黑德（Colson Whitehead）、欧内斯特·盖恩斯（Ernest Gaines）、查尔斯·约翰逊（Charles Johnson）、诗人兼小说家伊什梅尔·里德（Ishmael Reed）、诗人尤瑟夫·科曼亞卡（Yusef Komunyakaa）和丽塔·达夫（ Rita Dove）。另外还可再增加几个人物，如：剧作家洛兰·汉斯贝里（Lorraine Hansberry）、埃德·布林斯（Ed Bullins）、查尔斯·富勒（Charles Fuller）和奥古斯特·威尔逊（August Wilson）。小说家兼剧作家沃尔·索英卡（Wole Soyinka）、诗人德里克·沃尔科特（ Derek Walcott）、小说家奇努阿·阿基比（Chinua Achebe）、乔治·兰明（George Lamming）、牙买加·金凯德（Jamaica Kincaid）、查蒂·史密斯（Zadie Smith）、朱诺·迪亚斯（Junot Díaz）和埃德维热·丹蒂卡（Edwidge Danticat）等离散作家也可归入此类。

奇莱斯对于所谓黑人文学正在衰落的担忧，反映出精英阶层害怕嘻哈舞的兴起与种种“贫民区”价值标准在总体上会表示城市黑人文化生活走上了下坡路。这种“贫民区情结”在某种程度上像一种病毒，它降低了黑人艺术标准，玷污了黑人精英阶层。现在剩下的仅是完全由市场主导的无聊东西，迎合最低级、最没有文化的趣味。显然，这是小说家兼文化评论家斯坦利·克罗奇（Stanley Crouch） 等人所持的立场。这种观点不完全（甚或不主要）是势利心作祟。黑人文学花了十分漫长的时期才达到受大家尊敬的程度，公民大众认为它值得阅读，而文学界认为值得肯定。现在，对于许多黑人来说，黑人自己似乎在贬低它，用一些比米基·史毕兰（Mickey Spillane）好不了多少的垃圾小说充塞市场。作为受过迫害和历史上遭受羞辱的种族，黑人总会感到他们的文化产品缺乏信心、地位不稳，像市场中的讽刺漫画那样，很容易反过来对自己造成伤害。这一点并不让人感到惊奇。

看待这一问题的另一角度是，贫民区文学已使黑人文学民主化并扩大了它的广度与深度。在某些方面，城市文学可能显示出黑人文学的成熟而不是衰落。在美国各种具有自我意识的少数民族文学中，黑人文学毕竟有着最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至 1774 年菲莉丝·惠特利(Phyllis Wheatley)的第一本诗集、1845 年出版的《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平自述》（The Narrative of the Life of Frederick Douglass） 和 1861 年出版的哈丽雅特·雅各布斯（Harriet Jacobs）的《一名女奴的人生际遇》（Incidents in the Life of a Slave Girl）等古典文学。黑人比美国其他少数民族更早和更深入地思考文学作为政治和文化工具的重要性。哈莱姆文艺复兴是黑人在白人赞助下发起的运动，旨在通过发表第一流的文学作品获得文化上的地位和尊敬。贫民区文学的兴起并不否定过去的黑人文学，而是建议用其他办法来造就黑人文学并达到其他目的。而且，有些贫民区文学的作者远非商业文人：修女索尔加（Sister Souljah）-- 游历甚广的政治活动家与小说家 -- 是一位能力非凡的作家和思想家，无论其言词如何激烈。同样的评语也可用于作曲家纳尔逊·乔治（Nelson George）唯一的小说《城市罗曼史》（Urban Romance ）(1993 年出版)，显然这不是一部垃圾小说。埃里克·迪基（Eric Jerome Dickey） 与关（ K’wan）的某些书籍也值得一读。既写黑人浪漫史又写贫民区文学的一位重要人物是林恩·哈里斯（E. Lynn Harris），他是一位受欢迎的作家，其作品描写今天的黑人（特别是黑人妇女）面临的人际关系及其他重要题材。

我在两年前与班坦图书出版公司（Bantam Books）联系，成为两套年度丛书 -- 《黑人最佳散文选》（Best African American Essays）和《黑人最佳小说选》 （Best African American Fiction）-- 的总编。我希望确保这两套书对于不同层面的黑人读者都具有吸引力，因此我选择哈里斯（Harris）做《2009 年最佳黑人小说选》（Best African American Fiction of 2009）一书的客座编辑，这是丛书的第一卷。我把这几卷丛书视为一种机会，不仅把最优秀的黑人文学 -- 从 Z. Z. 沛克（Z. Z. Packer）和阿米纳·戈蒂埃（Amina Gautier）等年轻作家至塞缪尔·德莱尼（Samuel Delaney）和爱德华·琼斯（Edward P. Jones）等早已蜚声文坛的作家 -- 介绍给一般的阅读大众，而且在各类黑人文学之间起到某种联姻的作用。我想要通过林恩·哈里斯（E. Lynn Harris）的影响力把严肃的黑人文学介绍给可能不了解它或甚至不打算了解它的读者。判定这种尝试是否会获得成功还为时过早，但单是这种尝试就说明了黑人文学的复杂程度及其读者的细分程度，它显示了美国黑人的经历 -- 不管以何种方式体现于艺术 -- 具有一种深度和广度、一种普遍性，而且我可以断言，这种普遍性对黑人文学来说是一种很好的预兆，或许对美国各个少数民族的文学都是如此。

本文表达的见解不一定反映美国政府的观点或政策。

文学创作弥合混血民族之间的鸿沟

苏珊·鲍尔

苏珊·鲍尔（Susan Power ）是美洲印第安人的后裔，也有苏格兰和爱尔兰及英格兰血统。她曾就读哈佛大学法学院，做过律师，后从事写作，其创作主题常为达科他州印第安苏人部落的文化传统。她的第一部作品《跳草舞者》荣获 1995 年度笔会/海明威最佳处女作文学奖。她的其他作品包括《健心协会》（1998 年）以及《屋顶行走者》（2002 年）。其短篇小说刊登在《大西洋月刊》、《巴黎评论》、《犁铧》及《故事》等杂志上。苏珊·鲍尔目前在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汉姆莱大学（Hamline University）教授文学写作。

我母亲 1925 年出生于北达科他州的耶茨堡，那是立岩苏人印第安人保留地上的一个灰蒙蒙的城镇。母亲的名字在我们的部落语言达科他语中是“马赫陪雅博卡温”（Mahpeyabogawin），意为“呼唤风雨的女子”。当北美大平原上那贫瘠的土地变得干涸、松散、致命之际，她降临这个世界，仿佛预示着狂风暴雨将随之而来。她在一间小木屋里渡过童年，隔路相望即是我们著名的首领“坐牛”（Sitting Bull）的旧坟地。

她说：“他是我们的保护神。如果我们遇到麻烦，或被什么吓着，我们会跑到他那用石头堆成的墓碑前，大声呼唤，‘拉、拉、拉、拉，帮我们一把。” 我母亲关于苏人部落的记忆十分漫长，她说，“就像一只大象”，对此我已经耳熟能详。

“那是当然。它是‘唐卡什拉’（Tunkashila）的缩写，意为祖父。”

“可不是吗？”

我从小并没有专门学过达科他语，但会不少的词语，足以欣赏视觉语言带来的美感，每一个字即是一幅时隐时现的画面，蕴藏在我业已带入生活和艺术的那纷繁故事之中。我的出生地不在印第安人保留地，而在大都市芝加哥。母亲的记忆只为我的一半，因为父亲出生在纽约州，祖上为英格兰人、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的混血人，他们早在十七世纪就离开欧洲来美国冒险。他比母亲大十岁，念过大学，童年时家境优越。在自己的童年中，我喜欢幻想这一幕：如果他们相识时母亲才 10 岁而父亲已 20 岁，那多么令人惊诧！他当时是否特怜悯她？看她一脸灰朦朦，光着脚丫子，头发理得短短的、像男孩，还穿着破旧的背带裤。而他衣冠楚楚、说话斯文、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还总散发着“旧香”牌香水味儿，她是否会以为他来自另一世界？ 总之，我的父母亲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中却不期而遇，两人都爱读书，均在出版业谋生。我们总是这样相聚，无论我们之间过去或现在有多大差异，我们始终邂逅于对语言的热恋之中。

母亲是芝加哥美洲印第安人中心的创始人之一，而我却是在一个多部族社区长大成人的。那是一个温馨的世界，我学会了像上了年龄的温巴戈(Winnebago)族妇女一样跳着“洗衣板舞”（washboard），听着真正的鬼怪故事，还有误用魔术的警世故事。我知道

不同部族的礼拜仪式，其中有不少混合着传统信仰与基督教。这是我周末、晚间及夏天的生活，但并非我惟一的生活。父母亲还让我接触美国主流文化，带我去看芭蕾舞和戏剧，也去图书馆和博物馆。12 岁时，我“发现了”莎士比亚，在市中心的主图书馆浏览一整套录音唱片，还带回家一大堆，一听就是好几小时。我背诵着冗长而精彩的片段，特别喜欢有关死亡的情景。我在屋里如醉如痴地走来走去，口中念念有词：“埃及啊，我将离去，我在弥留之际。”似乎永无终结。我想，莎士比亚是讲故事的好手，与印第安人在一起一定会有宾至如归的感觉。我视他为亲朋好友，并从他那里获得灵感，如同从斯特拉·约翰逊(Stella Johnson)那里获得启发一样轻而易举，正是从约翰逊那里我听到了温巴戈人“雪鞋兄弟”的故事。

从幼儿园到中学毕业，我总是惟一的印第安裔学生。多年来，我目睹了社会的变迁，也从一个时常为老师带来麻烦的学生变成了一个他们器重而重点培养的对象。早年时，老师会给我那写得不错并进行了许多调研的文章打高分，却无法确定是否要我朗诵自己的文章(老师邀请其他所有同学这样做)，因为我对历史的看法与主流看法不同。读高中时，每当老师希望看到另一种观点时，就刻意在课堂上点我的名，让我发言，其目的是要向流行的观点发出挑战。过去对一个看似不合群的同学怀有戒心的好友们最终承认，她们羡慕我那神秘的生活，周末在纽约一处“长屋”参加莫霍克人(Mohawk)的传统婚礼，感恩节放假回来时我却成了芝加哥印第安人小姐，头上还戴着镶着珠宝的桂冠。我欣慰地看到有愈来愈多的读者像老师一样，对美国所有的故事、所有的声音产生兴趣。作为一名作家，我敞开了我那神秘生活的大门，欢迎任何人前来做客。

父亲去世后，我随母亲搬入公寓。她希望我不仅与她的家人保持联系，也不要忘记父亲的家人。于是，她将我们长长的门厅开辟为类似祖宗祠堂的小天地，东方和西方、印第安人和白人在这里交汇，直观地再现了不同的经历与希冀，而这一切集中体现在我的身上。母亲在东墙上挂着土地证和用早期铁板摄影法拍摄的父亲家人合影，中间为一长者，他银须飘逸，眼神却有几分淘气，这是我的曾曾祖父约瑟夫·亨利·吉尔摩(Joseph Henry Gilmore)——浸信会牧师、大学教授、诗人及颂歌《他指引我》的作词人，他的父亲曾是南北战争时期(1861-1865)新罕布什尔州州长。西墙上则挂着两根带珠子的鼓槌、一些苏人部落首领的油画肖像、用甜香草编织而成的散发着幽香的辫子。西墙的正中是我的外曾曾祖父马赫托·奴赫帕(Mahto Nuhpa，意为“双熊”)的照片。他是达科他州央克托奈(Yanktonnai)部落的世袭首领，一个著名的演说家，1863 年在白石山之战中誓死捍卫他的部下。我们家那深颜色的瓷砖走廊宛如一道峡谷，两位先祖隔谷相望。这两个同龄人代表着不同的文化，一生从未谋面，如今却于这一无以想像的地方相遇了。这一场景对母亲的想像力一定具有无比的诱惑力，以致她开始向我道起两位先祖有时在夜幕降临后所进行的争辨。

母亲说：“他们都是好人，但就是互不了解，所以发生争吵。即使是双熊这样令人尊重的首领，也沉不住气。两人终于交恶，你晚上得留心，不要穿过门厅。当然，两人都喜欢你，可他们正在气头上，在开枪放箭，他们并非明白他们的行为。你可能会在他们的交火中受伤！”

我小时候对母亲所说的一切确信不疑。夜深时，当我们就寝后，我一般不去门厅，但早上我会去看个虚实，看能否察觉交战的痕迹，看粉墙上是否有弹孔，地上是否有血迹。过道总是秩序井然，不过这不能说明问题。我想，先祖们担心他们的暴力和错误会吓着我，所以在停手后收拾了残局。

后来我离开了公寓和那道门厅。多年后，母亲向我提起她那些有关先祖们不和的故事，并说道最后的结局。

我责备母亲说："可不是吗？你让我吓得要死，晚上不敢走厅里，还以为发生了各种劫难。"

她笑哈哈地说："我知道，我知道。是很恐怖，但结局是完美的。"

"是吗？"

"是的。你的书《跳草舞者》出来后，我发现晚上门厅里风平浪静。再没有争吵或误解，也不再有愤怒。双方都为你以及你写的书而感到自豪，双方都感到他们似乎对你的成功起了重大作用。大家都有份儿。他们有聊不完的话题，有许多共识。他们可能意识到他们有许多原来没有想到的共同点。"

当我开始写小说时，我从未想到我的故事和语言、跃然于纸上的我的文学之恋、以及那些世代口头传诵的魔幻传奇，将会使我的血亲——那些先于我来到人世却被我的作品所打动的阴魂——重归于好。我以为，这是最佳结局：我的作品成了跨越鸿沟的桥梁，大家都因此感到得到了应有的荣誉，受到包容和尊重，人人都有发言权，人人都关注今后的命运。

记忆凝成的诗歌

奥费利娅·塞佩达

一位从家庭生活的记忆和母语中获得灵感的诗人。

奥费利娅·塞佩达是诗人和教育家，生于美国西南部的图霍诺·奥哈姆（Tohono O’odham）印第安部族。她长期致力于保护美国印第安原住民的语言并写下一部学生现在使用的《帕帕戈语法》（A Papago Grammar）。她出版了三本诗集，包括《海洋的力量：来自沙漠的诗歌》（Ocean Power: Poems from the Desert）和双语诗集《地球运动》（Earth Movements/Jewed I-Hoi）。她的业绩使她在 1999 年荣获了著名的麦克阿瑟人才奖（MacArthur Fellowship）。塞佩达在图森的亚利桑那大学（University of Arizona）教授美国印第安研究专业，并担任她创办的美国印第安语言发展研究所联合主任。

这是一个基本问题：是什么或是什么人对我的写作产生影响？但对我来说，这个问题回答起来并不容易。在诗歌《云彩形成的地方》（The Place Where Clouds Are Formed）中有这样的诗句：“他用带着手套的手背擦拭窗户，它要来了吗？”这行文字反映了我至今记忆犹新的影像和声音，清晰得就像最近才发生的事，但其实是我久远的童年时的记忆。我的许多诗歌出自单纯的记忆。漫长岁月中的记忆，对某些词、某些动作、某些动态的记忆。这些记忆浮到表面时会令我惊讶。当我作为成年人开始创作诗歌时，我轻易地回想起童年时记得的细枝末节，这令我感到十分有趣。在我的第一本诗集《海洋的力量：来自沙漠的诗歌》中，我有一篇前言文章，描述了这种现象以及我希望反映带给我记忆的种种事物的愿望。它们不仅属于我个人，也属于我生命中的许多人，特别是我的家人。它们常常是一种集体的记忆，但我是唯一一个把它们变成诗歌的人。

我可以描述许多帮助我形成记忆的声音和形象。我的图霍诺·奥哈姆母语功不可没，它是在亚利桑那州南部和索诺拉墨西哥北部使用的一种语言，并且仍然只是一种口头语言；鲜有读写形式。母语的口头形态迫使我练习记忆。随着这种语言进入 21 世纪，必须更加让这种记忆持续下去，无论是记住神圣的仪式、奥哈姆的歌谣，还是日常事件或是一个民族在特殊场合的声音。这些记忆都是口头语言的一部分，都在许多层面促进了创作，比如我的写作。现在，我尽量细致地观察我周围发生的小事。我留意日常的声音和人们的日常活动。我在记忆中为这些事留下特殊的符号，不知道哪一天某件事或某个词就会浮现出来，引导我创作新的诗篇。

摘下云彩

奥费利娅·塞佩达

Ñ-ku'ipadkaj 'ant 'an o 'ols g cewagĭ.
我会用我的采集棒勾住云彩。
Nt o 'i-wannio k o 'i-hudiñ g cewagĭ.
我会用我的采集棒摘下云彩。
Ñ-ku'ipadkaj 'ant o 'i-siho g cewagĭ.
我会用我的采集棒打散云彩。
梦中远远传来的噪音搅扰了他的安眠，
似乎数月来首次闻到了湿润的泥土气息。
分子的变化突然地进入了鼻腔。
这似曾相识的气息让他沉吟，那是什么气息？
是雨。
沙漠里的雨。
这样的认知让他放松下来，他翻过身，继续睡去，
梦见女人们拿着采集棒
伸向天空。

《摘下云彩》选自奥菲利亚·塞佩达的诗集《海洋的力量》(Ocean Power)。奥菲利亚·塞佩达 1995 年版权所有。经亚利桑那大学出版社许可再版。

世界上最坚强的印第安人

舍曼·亚历克西

舍曼·亚历克西是一位科达伦（Coeur d’Alene）印第安人，生长在位于华盛顿州威尔皮尼特的斯波坎印第安保留区。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独行侠与堂拓在天堂打架》（The Lone Ranger and Tonto Fistfight in Heaven）（1993 年）获得笔会/海明威最佳处女作奖 PEN/Hemingway Award for Best First Fiction）。亚历克西将小说集中的一个故事改编成电影《狼烟》（Smoke Signals）并获奖。在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布鲁斯保留区》（Reservation Blues）（1995 年）出版以后，他被《格兰塔》（Granta）杂志提名为美国最佳青年小说家。他的作品丰富，获奖频频。他同时还是一位杰出的单口相声演员。

下面的节选摘自他的短篇小说集《世界上最坚强的印第安人》（The Toughest Indian in the World），从中可对其作品的风格略见一斑。第一部分摘自与小说集同名的短篇。

1975 年，或者是 76、77 年，我父亲沿着公路开车时会注意到远处一、两英里外站在路边的搭车人。

如果那是个印第安人，他会说“印第安人”，他从没说错过，尽管我绝对无法分清远处的人影是男是女，更何况是不是印第安人。

如果远处的人是白人，我父亲会一言不发地开过去。

我就这样学会在有白人在场时保持沉默。

这种沉默与仇恨、痛苦或恐惧无关。印第安人只是愿意相信，如果他们一直视而不见，白人会自动消失，或许灰飞烟灭。或许一千个白人家庭仍在等待他们的子女归家，却没办法在他们化成晨雾飘回家时认出他们。

“我们最好停一下，”我妈妈在副驾驶座上说。她是典型的斯波坎女人，头上总是紧束着一块紫色的印花大手帕。

这些天，她的印花大手帕通常是红色的。颜色的选择自有其原因、动机和习俗，但我妈妈总是秘而不宣。

“让点地方，”我父亲对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说，我们坐在我家蓝色面包车乘客位置的地板上。我们坐在地毯样品上，因为我父亲从一个白人疯子手里买到这辆货车之后不久就在一次有节制的盛怒中拆掉了座椅。

我现在有三个兄弟和三个姐妹。当时，我有四个兄弟、四个姐妹。我错过了其中一个的葬礼，在另一个的葬礼上哭到病倒。

“让点地方，”我父亲又说——他每件事都说两遍——只有那样我们才会爬到一边，给搭车的印第安人腾出地方。

当然，为一个搭车人腾地方容易，但印第安人通常都是成群结队地旅行。我们有一、两次搭载了一整支全是印第安人的篮球队，加上他们的教练、女朋友和堂兄弟。十五、二十个印第安陌生人和九个好奇的印第安小孩一起挤在蓝色面包车的后车厢。

回想那些日子，我喜欢印第安人的味道，特别是搭车的印第安人。他们常常是醉醺醺的，有必要用香皂和毛巾，总是随时可以引吭高歌。

哦，那歌声！印第安布鲁斯是最高音量的吼叫。我们称之为“49s”——那些把汉克·威廉姆斯（Hank Williams）录制的每一首歌填入印第安歌词的文化混合歌曲。汉克是我们的耶稣，帕特兹·克林(Patsy Cline)是我们的圣母玛利亚，弗雷迪·范德尔（Freddy Fender）、乔治·琼斯（George Jones）、康威·崔提（Conway Twitty）、劳瑞达·莲（Loretta Lynn）、泰咪·温妮特（Tammy Wynette）、查理·普莱德（Charley Pride）、隆尼·梅河普（Ronnie Milsap）、塔尼亚·塔克（Tanya Tucker）、马蒂·罗宾斯（Marty Robbins）、强尼·豪顿（Johnny Horton）、唐纳·法戈（Donna Fargo）和查理·里奇（Charlie Rich）是我们的追随者。

我们都知道怀旧是危险的，但我可以良知坦然地回忆那些时光。当然，我们现在生活的年代不同了，如今搭车的印第安人不像过去那么多。

在《一个好人》（One Good Man）中，叙述者一边照顾身患糖尿病并截肢、从医院回到家中静待死亡的父亲，一边审视自己的人生。他在整个故事中反复地向自己和读者提出一个问题：“什么是印第安人？”，同时每次都给出不同的答案。“什么是印第安人？是能不打招呼进出十七家的孩子吗？”或者，“什么是印第安人？是能站在门口看着父亲睡觉的儿子吗？”他父亲对他讲述了一场梦之后，他决定带着父亲到墨西哥旅行。以下就是故事的最后一幕。

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特卡特南边，面包车抛锚了。五分钟之后，在墨西哥的特卡特北边，我父亲的轮椅坏了。

我们站在被明晃晃的阳光烤得炽热的柏油路上（我是唯一站着的人！）。

“我们差不多就要到了，”我父亲说。

“会有人让我们搭车的，”我说。

“你会让我们搭车吗？”

“两个棕色皮肤的家伙，其中一个坐着轮椅？我想移民警察可能让我们上车。”

“嗯，那样的话，他们可能会把我们当成非法入境的外国人，把我们驱逐出境。”

“用那种方法进入墨西哥真是极度讽刺。”

我想问问父亲他有没有什么遗憾。我想问他平生做过最坏的事是什么。他最大的过错。我想问他天主教会不会有什么理由把他视为圣徒。我想打开这本字典，从中查找信仰、希望、善良、悲伤、番茄、儿子、母亲、丈夫、贞洁、耶稣、木头、牺牲、痛苦、脚、妻子、拇指、手、面包和性的定义。

“你信上帝吗？”我问父亲。

“上帝有许多潜能，”他说。

“你祈祷时都祈求什么？”我问他。

“这与你无关，”他说。

我们笑了。我们等有人来帮助我们等了好几个小时。什么是印第安人？我把父亲从轮椅上背下来，背着他走过边境。

版权所有© 2000 舍曼·亚历克西。Grove/大西洋公司许可使用。

教授做人的艺术

---古代土著居民的口头文学传统日渐兴盛

利·特修恩

最早在美洲大陆定居的原住民的文学凭记忆承载，通过口头流传。幸存的原住民族成员仍然保持这一传统。

利·特修恩(Lea Terhune)是本期美国电子期刊的责任编辑。

文字出现之前就有了故事。千百年来，故事在家庭和社群中代代相传，承载着各个社会的价值观与传说。才华横溢的讲故事人凭记忆掌握数以百计的故事和诗文，他们是备受尊敬的艺人和导师，启迪智慧、传授价值、引导言行。

发明文字之后，许多口头流传的故事被用文字记录下来，但讲故事人在传统社会里继续备受欢迎。即使在二十世纪的科技革命带来收音机、电视机、互联网和数字媒体之后，讲故事人也并没有消失。

美洲原住民的许多部落或曰民族之间都有丰富的口头传统，他们早在第一批欧洲开拓者到来之前就已经在美洲北部和南部安家。如今，仍然保留在他们自己社群内的故事，由于有飒妮·杜利（Sunny Dooley）和杜薇·汤普森(Dovie Thomason)这样的讲故事人的努力，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听众。杜利是纳瓦霍（Navajo）族人，或称戴恩（Diné）人，汤普森则是拉科塔（Lakota）和基奥瓦阿帕切Kiowa Apache人的后裔。在位于华盛顿的国立美国印第安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the American Indian表演之后，她们坐下来商讨21世纪的讲故事方法。

杜利是纳瓦霍人传统的一位严谨解说者。她遵循身为吟唱者的祖父的忠告，只在受到邀请时讲故事，不做宣传。她在亚利桑那州的纳瓦霍保留区长大，谙熟部落文化，戴恩语为母语。纳瓦霍人是美国目前最大的印第安民族，曾经是一个半游牧民族。汤普森出生在位于大平原 Great Plains）上的印第安部族拉科塔族，在野牛群大批被杀之前，这个民族一直主要以捕猎水牛为生。汤普森同时具有基奥瓦阿帕切血统，这是一个具有勇士传奇色彩的部族。

虽然部落与部落间的口头传统不同，但目的相似。飒妮·杜利说：“原住民族数以百计，每个民族和部落的故事都有特定的目的，”对纳瓦霍人而言，“故事用来传播知识，教育人们怎样做人。”故事的精神层面使它成为纳瓦霍仪式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被用于“愈合、育人、娱乐，它能给人以归属感”。

杜薇·汤普森代表着多种原住民传统。除了她出生的部落以外，她还被普韦布洛人（Pueblo）接纳，“易洛魁族也借用她作为讲故事人，因为她们需要讲故事人。”她同意

杜利的说法。用汤普森的话说，在她所传承的传统中，“与萨妮所说的讲故事目的和要点都很相似。故事指点我们如何做人，我们需要一张蓝图，某种指路图，指引我们怎样作出选择和决定。”

故事育人

故事帮助父母教育子女，“在部落中保持某些做人的方式，”汤普森说。在描述拉科塔和基奥瓦阿帕切人对独立和个性的尊重时，她回想起她的祖母，她从祖母那里学到了许多故事。“她说她给我讲故事是为了我能自由。我认为那可能体现了她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通过讲故事教育自我约束、自制的经历，”而并不是硬性规定行为方式。汤普森说：“控制他人行为并不属于禁忌，但令人不快，不恰当。”

故事被用来向人们传授负责和自制的价值观。通过一些神话中的精怪——如Coyote、Iktomi和Raccoon——向人们讲述具有警示意义的故事，告诫人们作恶的后果和行善的益处。汤普森说，Coyote和Iktomi“教导人们，你能做一件事并不等于你应该做。”这些故事发人深思，“我可以那么做。我该做吗？或许，我不该那么做。”这种做法体现出一种“尊重而不是对峙”或控制。故事在显示缺陷的同时，允许人自己作出选择。汤普森解释说：“人们可以通过故事自问，我是那只鸟吗？我是谁？为什么对我讲这个故事？”

汤普森和杜利都记得童年犯错之后不得不听故事的经历，有时一连听几个小时。杜利说，讲故事教给人们“所有生活中的善。它告诉你哪些劈柴可以捡来生火取暖，哪些动物可以猎食。而且我认为，它还让你明白周围的环境。”

飒妮·杜利和杜薇·汤普森开始在自己的部落里讲故事。但是当听众越来越多以后，她们遇到矛盾：怎样处理宗教性和职业性讲故事。飒妮·杜利说：“你几乎不得不把自己同文化、仪式的讲故事分离开来，然后转向另一面，职业讲故事。”纳瓦霍仪式故事既没有变化也没有创新。有些已经“绝迹”——“现在已经没有过去那么多，但还有很多可以讲。”纳瓦霍人的故事很长，通常需要几天才能讲完，在短暂的故事会上将故事解释清楚是一大难题。新故事是在杜利所说的“专业”领域创作的。“新故事是以这种特殊风格来讲述的，而且采用各种媒体，并不仅仅是口头形式。”她表示，她自己的贡献是提供了“在双重文化世界中成长的自身故事”，并且说：“我认为所有在自己国家属于原住民族的人都能产生同感，感到熟悉 ，”因为他们都有着“欧洲征服史”。原住民文化在殖民时代幸存下来。杜利说，殖民的影响表现在“那些可以说侵蚀了我们文化本色的政治制度。我认为这些故事是在重现我们的文化本色。”

汤普森也有类似的在传统讲故事和职业讲故事之间把握平衡的“双重体验”。有些故事她从来不在部落以外的地方讲。她担心人们把部落故事当成民间传说，在可以对故事自由发挥的公共场合，会使神圣的传统遭到扭曲。她说：“进入职业讲故事非常重要，因为我在这个行业里看到讲故事遭到了很多破坏和伤害，有意和无意都有。”她认为创作新

的故事可能是有必要的。她说："我正在和世界各地的一些讲故事人，原住民讲故事人，一道努力，了解创作新故事的必要性。21世纪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故事中不曾涉及的新行为，"她举了两个例子：孩子们在帮派暴力中"互相残杀"和她所说的"急躁症……我们同时做好几样事，我们做的事太多……人们的生活节奏从没像现在这么快。我们需要通过故事汲取智慧。"

重建和谐

传统讲故事是季节性的。汤普森回忆了一位长辈说过的话："世界是颠倒的。我们遵循季节的交替，但是我们生活的世界却…….不是如此。从前每到冬天我们就停下活计。如今我们装上链条，让【汽车】转换成四轮驱动。我们失去了尖顶帐篷里的安宁。冬季来临时我们不再留在营地里休闲，我们没有了反思的时间。"

汤普森继续说："那么在这个颠倒的世界里，我们要不要关注我们的传统、要不要看看我们的世界？我们应作出哪些改变？哪里有危险？我们从哪里改变？哪些我们不改变？她认为，传统故事应保持不变。"骨架不能变。故事的分量和长短可以变，它们或增或减，事务有适应性……但对什么是合理的改变必须取得共识。"

讲故事帮助找回失去的和谐。用杜利的话说，纳瓦霍的故事和仪式"恢复和睦，让人再度进入一种与万物和谐共处的状态"。因此，她说："我们的故事涉及从有序到无序再回到有序的各种情况，我们就是存在于这种状态下。"

这两位女士都对用"多元文化"形容美国印第安人颇有微词。汤普森说："我们不是少数民族，当然不是。我们是主权民族，具有独特的法律地位；我们是美洲原住民，这把我们置于一个全球性的国际法律和关系框架中，当我们成为'土著美国人'（Native Americans）时这一点就消失了。"她表示，"我希望我们融入世界，开始使用原住民或更具体的词。"她说，身为在这里数千年之久的最早的民族的后代，经历与其他近期移民是不一样的。

飒妮·杜利表示同意："多元文化的理念令我一震，我想，'谁的文化？'"她说起她与其他非盎格鲁/欧洲文化的接触："你到非洲丛林中去；我们丰富的文化如此相似。它没有什么'多元'可言。就像是，我知道我的经历，他们知道他们的经历。这些经历很相似或相像。"

故事需要时间反思，而时间是现代世界所缺乏的。杜利怀疑"人们会不会真正再听故事。因为我确实认为人们需要安静的时间。"汤普森补充说，"在不用笔记的情况下清晰、流畅地口头表达，把所有内容记在心里，这需要有一些安静和静止的时间才能做到，还需要听众保持安静，精神专注，静静聆听。"她说，"我们已经忽略了古老的默契、演讲和聆听。"

汤普森说，比较积极的一面是，现在学者们“不再把我们说成濒临灭绝、原始或落后，【他们】认识到我们的口头传统和世界文学一样具有丰富的潜能”。杜利用一只造型优美的纳瓦霍篮子作为讲故事的道具，她说，那种认为“东西只有写到纸上才能有效”的态度令她厌烦。她用篮子作道具是“因为篮子上没写任何东西。它包含一种造型，这种造型不变。但它和任何人的书面历史同样有效。”

杜利出版了诗歌，汤普森以传统的部落故事为题材创作了歌曲和儿童读物。但她们的主要任务是进行被她们都视为讲故事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人与人的直接接触，从而使之发挥最大的作用。美国国立美洲印第安人博物馆展示了杜利和汤普森通过个人化的、经过时间考验的教育故事吸引听众的能力。她们的故事得到了成年观众的热烈鼓掌和孩子们快乐的尖叫。Coyote和Iktomi的奇遇以及玉米、土豆、番茄、辣椒、豆子和巧克力从美国原住民的文化传遍世界变成所有人喜爱食品的过程令他们深深着迷。

黑脚吟游歌唱家歌唱传统

利·特修恩

你感觉到水牛的游动

你听到驿马车轮的滚动……

你骑上你的小马驹

披着世纪晨曦在莫辛卡平滩踏足

足迹变成了大路

大路变成了老路……

我们聆听你讲述的典故。

——摘自杰克·格拉德斯通的《祖母对我说》（Speak to Me Grandma）

杰克·格拉德斯通（Jack Gladstone）是蒙大拿州的歌词作者，也是北部大平原（Great Plains）地区黑脚（Blackfeet）部族的讲故事人，他通过诗歌传承黑脚部落的传统。格拉德斯通在祖母的膝下听到了许多故事，他的歌曲《祖母对我说》就是纪念祖母的一首歌。他在自己的歌曲、表演和演讲中都提到黑脚部族的故事。

格拉德斯通说："保持讲故事的传统是为了重申我们的特征。"他也在其他一些文化中看到相似之处，比如澳大利亚原住民的梦幻时代（Dreamtime）故事："黑脚部族称之为'远久时代'——或从前。"

"但是当我们进入这一传统的画卷时，一定要把这些故事是否符合逻辑、是否理性或者属实等抛在一边。它们传达的道理可能不属于历史真相，而是一些永恒的智慧。格拉德斯通说，故事展示" "光与影，英雄和骗子。骗子认为自己是宇宙的中心和关注焦点，……而英雄认为自己只是某种更宏观存在的一部分，自己在为更高的力量服务。"他们是"能量的人格化"；"我们称他们为神……是那种伟大、神秘感觉的表达"。他说，"伟大神秘"是黑脚部族用来定义超常事物的方法——"两个形容词。至此我们就没有更多言词来表达了。

他说："我看到身边发生的一个悲剧是——在一定程度上也发生在我内心和我自己家里——以前传下来故事不再得到过去那种程度的传承。"他将这归结于现代科技带来的许多干扰。他感到物质和精神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他说："在我祖母看来，这两者之间是有流动的。"他试图通过传奇故事、教育故事和"我个人生活的比喻"来传承古老的智

慧。他的歌曲唤起自然、精神和日常生活经历的力量。“我不是让我的听众停留在过去，……而是尽力给听众带来一种感情上的降服，努力把过去带到现在，带到此时此刻……把那些永恒的感悟置于当下。”

格拉德斯通说：美国是一个“边走边相互学习的国家”：

这是从众人梦想中诞生的国家。
我们是先人故事的继承者；
是山川河流的守护人。

---摘自《美国……传承下去》（“America…Pass It On”）

口头故事传统能在短暂的媒体毁灭以后继续存在。他说：“从长远来说，我们真正能够依赖的唯一东西就是口头的传统。讲故事不仅让知识、价值观和身份的归属得到重新确认和肯定，而且它包含着成长做人的概念。我们不断学做人。如果没有了我们的故事，我们就不再会做人。”

美国幸运饼

珍妮弗·李

珍妮弗· 李（Jennifer 8. Lee，中文名李竞）为《寻访幸运饼历史：华人饮食世界历险记》（The Fortune Cookie Chronicles: Adventures in the World of Chinese Food，2008 年出版 ）一书作者，她开设的“真人实拍博客”（live-action blog）专门配合此书，对幸运饼的由来进行探寻。她目前为《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记者。

美国人喜爱幸运饼。

幸运饼种类繁多：圣诞节幸运饼、婚礼幸运饼、情人节幸运饼、献殿节幸运饼等等。连爱犬也有自己磨牙的幸运饼。

幸运饼为外形弯曲、散发着黄油香草味的薄饼，饼内藏折着签语条，美国人对它情有独钟。饼屋卖幸运饼杯形蛋糕。甚至还有幸运饼珠宝。高档百货商店 Niemen Marcus 就出售 14K 金并镶有宝石的幸运饼，售价为 1100 美元。更有甚者，某些电脑的外形，设计得酷似幸运饼。你可买到幸运饼硬盘驱动器。还有幸运饼收集册，颇似影集，但主要是用来珍藏从幸运饼内抽出的签语条。

美国人对那些小纸条上的只言片语十分狂热，对上面常印着的幸运抽奖号码更是到了迷信的地步。2005 年 3 月，全美有 110 人中奖，一共赢得 1900 万美元，他们靠的就是幸运饼内签语条下方的一串不起眼的数字。两个月后，又有 84 人在同一天主要靠此中奖。

有趣的是，大部分美国人以为幸运饼产于中国，因为这些小饼子是中餐馆打发的。我曾经就是这么认为的。我毕竟出生在纽约城，小时候，我们常在中餐馆吃饭时拿到幸运饼。可我知道什么呢？我直到 20 出头，才第一次走进中国。

念中学时，我读了谭恩美（Amy Tan）的畅销小说《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原来幸运饼并非产于中国。书中的华裔女性人物在旧金山一家幸运饼工厂拿幸运饼说笑。

我一时目瞪口呆。幸运饼不是中国的？

就仿佛是知道了自己是被领养的，同时又听说圣诞老人根本不存在。这简直颠覆了我的世界观。

这一震惊却激起了我对幸运饼的好奇心。十年后，我开始寻访美国各地，足迹甚至遍及遥远的世界他乡：秘鲁、巴西、印度、中国和日本。我想了解这种神秘饼干的由来。

我终于发现：幸运饼在美国得到普遍承认，但在中国却令人迷惑不解。如果你给中国人幸运饼，他们则会发愣。他们先会问你，“这是什么？”你跟他们说，这是美国产的，他们会点头。于是，他们拿起来咬一口，不过，一旦发现口中或饼干中有张小纸条则会大吃一惊。他们会问你那纸条是何物。你告诉他们：“是幸运语。”他们便喃喃地说：“美国人真怪。他们为何将纸条夹在饼干里？”

追溯幸运饼的故事说来话长，就像忽然扯开一根长长的纱线。我从加州上世纪初开业的日本移民老字号饼屋那里找到幸运饼的线索，其中一些饼屋今天仍在营业。

更令我惊诧的是，我发现幸运饼的源头在日本，而且时至今日京都古城的一些家庭小饼店还在做幸运饼。有一幅作于十九世纪晚期的日本画上再现了一名穿着和服的男子，那人好像在制作幸运饼，而幸运饼在美国被人知晓，还是几十年后的事。

日本幸运饼名叫“辻占煎餅”（tsujiura senbei ）和“喇叭煎饼”（suzu senbei），比美国黄灿灿的幸运饼要大、颜色要深。日式幸运饼含有芝麻和豆面酱，散发着浓郁的坚果味儿。

幸运饼那么，日式幸运饼又是如何在中餐馆大行其道的呢？

我一边探索着，一边悟出道理。二战期间，美国政府将许多日裔关了起来，原因是担心他们出卖美国，自然包括那些制作幸运饼的日本人。被关在拘留营的日本人中有三分之二为美国公民，几十年后美国政府最终作出道歉。

历经三年时间，我弄清了我如此着迷的真正原由：我对幸运饼的探源，实质上是对自我的探寻。

中国是全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移民输出国。美国则是全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移民接纳国。我和我从小就吃的中餐一样，横跨这两股文化流。

幸运饼象征着华裔融入他们的第二故乡。美国人过去一般会理所当然地相信这些具有异国情调的幸运饼来自遥远的中国，然而饼中的签语并非出自中国哲人，中国人则乐意出力，生产数百万的幸运饼，将来还会达到数十亿。若干年后，当中国人看着幸运饼迷惑不解时，那也无伤大雅，毕竟这一外型像新月的香脆小饼已得到美国人的普遍青睐。

美国人瞧着幸运饼，自然会联想到“中国”。事实上，幸运饼最初源于日本，后被华人推而广之，但最终享用它们的还是美国人。

我们在美国老说：“这是美国传统，就像苹果派一样。” 不过我们应该扪心自问，如果我们衡量美国传统的尺子就是苹果派的话，那么我们多久吃一次苹果派？ 我们

又多久碰一次幸运饼？幸运饼的年产量为 30 亿个，也就是说全美的成人和儿童平均每人 10 个。

有时人们看着我就认为他们巧遇了一个华人。他们问：“你是哪里人？”（答曰：纽约人，生于斯，长于斯，仍居于斯）。但如果他们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话，则会听到一个地道的美国人在说话。

书海寻友

阮碧铭

阮碧铭（Bich Minh Nguyen）的家人在 1975 年西贡沦陷前夕逃离了越南，当时她还是一个婴孩。其第一部书《偷吃菩萨的晚餐》（Stealing Buddha’s Dinner）描写了一个越南移民家庭的孩子在美国中西部成长的故事，该作品 2005 年荣获叶拉德笔会奖。她的长篇小说《矮个子姑娘》（Short Girls）于 2009 年出版。阮碧铭目前在印第安纳州西拉斐特市的普渡大学教授文学写作与亚美文学等课程。

作为一名越南裔美国人，我的童年是在密歇根州一座小城度过的，那里有着几乎清一色的白人，书籍成了我最亲密无间的朋友和同盟。由于有了书，我不必每日煞费苦心琢磨着如何在家中文化与外部文化之中左右逢源。书籍还给我教诲，引导人生之路：我孩提时代就明白，要想在这个国家生存立足并获得成功，必须尽力全面掌握语言。于是，我无所不读：杂志、麦片盒子背面的文字说明、手册说明书、尤其是图书馆藏书。作为一个比较拘泥的孩子，我想读英语文学最有助于我掌握英文。简·奥斯汀、查尔斯·狄更斯以及勃朗特三姊妹成了我一见钟情的早期“成人”作家。他们对人物的刻画、情节的把握、对话的使用、意象的应用以及行文句式等等，就是在今天也影响着我，并对我在小说和纪实作品中运用这些元素仍有帮助。他们还使我爱上了“经典作品”， 从希腊悲剧到伊迪丝·华顿到威廉·福克纳，几乎无所不包。

进入大学后，我开始广泛选修文学课，我意识到这之间有着许多文学观点，或许作为一个越南裔美国人，我也可写写自己的生活。汤亭亭的《女勇士》（副标题为“女孩在鬼怪中的成长史”）一书改变了我的世界。作家时常读书，其原因之一是，从其他文字中获得灵感，了解语言和思想的可塑性。《女勇士》为我开拓了无限视野，使我清晰地认识到个性与族裔的本质，也向我展示，我可以通过写作来发出自己的声音。从读汤亭亭开始，阅读使我豁然开朗，亚美作家和移民作家为我敞开了一个崭新而辽阔的文学世界，这些作家包括任碧莲（Gish Jen）、李昌来（Chang-rae Lee）、杰西卡·哈格多恩（Jessica Hagedorn ）、山本久惠（Hisaye Yamamoto）、巴拉蒂·慕克吉（Bharati Mukherjee）、桑德拉·希斯内罗斯 （Sandra Cisneros）、埃德维热·丹蒂卡（Edwidge Danticat）、钟芭·拉希莉（Jhumpa Lahiri）以及朱诺·迪亚斯(Junot Díaz) 。他们的作品以及那些经典仍为我的创作带来灵感，使我耳目一新，文学可昭示今昔，使之浑为一体；文学可使不同文化互为兼容，从更高的角度来审视人类生活与文学活动。

语言的背叛

哈金

哈金是一位华裔美国作家。他出生在中国，于 1984 年移民美国后开始用英文创作小说。他发表过五本小说，包括《自由生活》(A Free Life, 2007)、《等候》(Waiting, 1999)和《战废品》(War Trash, 2005)。其中《等候》连获美国国家图书奖(National Book Award)和笔会/福克纳奖(PEN/Faulkner Award)，《战废品》获笔会/福克纳奖。

以下内容摘自哈金在莱斯大学(Rice University)举办的"坎贝尔讲座"(Campbell Lectures)的讲义汇编《移民作家》(The Writer as Migrant, 2008)。

"背叛"的反义词是"忠诚"或"效忠"。移民作家对这几个词感到不安，对身不在母国感到内疚，而母国一些同胞历来将此视为"离弃"。然而，选择用非母语写作，才是真正的背叛。无论作家本人怎样认为有理由，用外语创作都是一种作家脱离母语、将创作能量注入另一种语言的背叛行为。这种语言背叛是移民作家迈出的最大胆的一步，此后的其他任何疏离之举都再不足挂齿。

从古至今，一向是个人被冠以背叛国家之名。我们为什么不应当转而指责国家背叛个人呢？况且大多数国家一贯都有背叛本国公民之举。国家对作家所犯的最大罪行莫过于使他无法本着艺术良知诚实写作。

但非可能，作家都会尽可能留在自己熟悉的母语内。德国作家西博尔德(W. G. Sebald)在英国生活和教学长达 30 多年，精通英文和法文，但他一直用母语写作。当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改用英文时，他的回答是：没有必要。他能够这样回答的原因想必是，由于德文是一种主要的欧洲语言，把他的作品翻译成其他欧洲语言并不困难。相比之下，法裔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是在年过六旬后才开始用法文写作。这一壮举可能反映着让这位小说家必须作出重大改变的某种危机。如果我们将昆德拉后期用法文创作的小说与其早年用捷克文撰写的著作比较一下就会发现，他继《不朽》(Immortality)之后的晚期作品在篇幅上缩短不少。然而，他改用法文是一种以不屈不挠的精神进行的文学上的大胆冒险。正如他的小说《无知》(Ignorance)中的主人公将奥德修斯重回伊萨卡等同于承认"生命有止境"一样，昆德拉自己的征途也是不能倒回再继续的。这也能够说明他将法国称为"第二故乡"的原因。

有人曾问我为什么用英文写作。我往往这样回答："为了生存。"人们会将"生存"等同于"生计"，因而称赞我谦逊、亦或卑微的动机。其实，物质生存只是动机的一个方面，它还包含另一方面，那就是：存在——过有意义的生活。存在还意味着最充分地利用人生，追求自己的理想。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8 年版权所有。保留一切权利。

新移民故事：朱诺·迪亚斯和拉美小说

格伦达·卡皮奥

格伦达·卡皮奥（Glenda Carpio）是《笑到极致：奴隶小说中的黑色幽默》（Laughing Fit To Kill: Black Humor in the Fictions of Slavery）（2008年）的作者，目前正在撰写一本关于美洲黑人和拉丁裔小说的新作。她是位于马萨诸塞州剑桥的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非洲人和非洲裔美国人研究与英文（African and African-American Studies and English）专业的副教授。

2008年普利策奖（Pulitzer Prize）得主、小说《奥斯卡·瓦奥短暂而奇妙的一生》（The Brief Wondrous Life of Oscar Wao）（2007年）作者朱诺·迪亚斯（Junot Díaz）最近接受了讽刺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史蒂芬·科拜尔（Stephen Colbert）的采访。科拜尔揶揄地问这位七岁从多米尼加共和国来到美国的作家，如今获得普利策奖是不是剥夺了一位美国人获奖的机会。迪亚斯机敏地答道，既然普利策本人也是一位移民，他一定会乐见自己得奖。他们二人玩笑中的对话其实反映了与某些现象相关的警觉不安，即拉美裔现在成为美国发展最快的少数族裔群体，他们的人口已经超过了非洲裔美国人。当然，在这种警觉不安的背后，是对一个非白人的多数群体的担忧，以及对拉美裔将成为一个与非裔不公平地竞争工作机会等资源的非黑人的多数群体的恐惧。

但是，谁是拉美裔、什么是拉美裔？拉美裔（Latino）这个词隐去了阶层、性别、种族、籍贯地区和殖民历史的巨大差异。即使是其他相似的词汇，比如西班牙裔（Hispanic），也有误导性，因为许多拉美裔不讲西班牙语。拉美裔和西班牙裔充其量是一个有失狭窄的用词，因为它们泛泛地意指当代美国的大量移民和移民后代共有的复杂经历——既有多国色彩，又专具美国特征。因此，这个群体如何界定自己和外界如何界定他们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然而，在美国主流媒体中，拉美裔一词（我也倾向用这个词）几乎完全失去了其复杂的含义，特别是一些流行用法往往抹去了拉美裔的种族多样性。许多拉美裔是黑人，特别是以美国的行事标准而言。他们常常也是美洲原住民（来自美洲数量繁多的原住民文化），但这一事实也被“拉美裔”和“西班牙裔”的分类掩盖了。

自从1996年首次在文坛亮相，多米尼加裔作家朱诺·迪亚斯一直以他敏锐雄辩的语言诠释在美国做一名非裔-拉美裔和移民的复杂性。在他的短篇小说集《沉溺》（Drown）（2006年）和长篇小说中，迪亚斯通过恰当的幽默，防止将移民故事商品化和将移民类型简单脸谱化。迪亚斯的敏锐很像已故的表演大师、喜剧演员格劳乔·马克斯（Groucho Marx）。马克斯喜欢拿美国的人行道都是用金子铺的这种老说法开玩笑。他说，移民们到了美国以后会发现，第一，街道不是金子铺的，第二，街道根本就没铺，第三，人们在指望他们铺路。这是迪亚斯最强有力的天分之一：他带着富于讥讽的幽默感从事移民文学创作，但并不陷于身份归属和移民问题，从非洲-拉美文学创作，但不纠结种族问题。他所注重的是用语言刻画和艺术地再现身为在美国的黑人、拉美裔和移民的含义。

迪亚斯挑战肤色界限以及美国移民文学中长期崇尚的传统——他拒绝像人们通常所期待的那样充当一个向白人为主体的读者解释自身所属族群的介绍者；他拒绝对连字符号所代表的双语和双文化生活经历怨声载道。迪亚斯也拒绝把拉美文化白人化。相反，他热爱他出生国家的非洲渊源，探索它的种族复杂性。最后，他呼呼少数族裔的作家互相联系。他赞赏那种能够即兴融合不同语言的自由，他尝试过融入——在他的作品定位的历史框架中——多米尼加西班牙文、拉美西班牙文、 美国黑人俚语以及科幻语言。他强调海外非洲人所具有的、为美洲不同文化群体所分享的共同历史背景。迪亚斯通过生动活泼的语言表达出代表非裔-拉美裔意识的声音——这是一种在美国和其他美洲国家往往喑然无声的意识，与此同时，将一种大胆鲜明的表达移民心声的新模式呈现在世人眼前。

失落之城电台

丹尼尔·阿拉尔孔

秘鲁出生的小说家丹尼尔·阿拉尔孔（Daniel Alarcón）在 1980 年他三岁时与家人从动荡的秘鲁利马移民到美国。他的叔叔因反对毛派游击队组织“光辉道路”（Shining Path）而在 1989 年失踪并被杀。战争充斥着阿拉尔孔的许多作品。他的第一部作品《烛光下的战争》（War by Candlelight ，2006 年出版）入围笔会/海明威奖（PEN/Hemingway Award）最后一轮评选。他获得多项享有盛名的研究基金，还担任在利马发行的获奖杂志《黑标》（Etiqueta Negra）的编辑。他目前是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拉美研究中心的访问学者。

他的第一部小说《失落之城电台》（Lost City Radio，2007 年出版）以一个虚构的拉美国家为背景。小说通过女主人公失踪的丈夫拉伊（Ray）的命运，叙述了一个战争和失踪者的故事。阿拉尔孔在这里描述了拉伊还在学生时代第一次被卷入政治暴力前的一个宁静的场面。

镇里的监狱离广场两个街区，在一条僻静小街上，两旁是女仆和石匠们不起眼的住房。这座监狱的楼房外表是淡蓝色的，用一幅粗糙的国徽油画作点缀。如果凑近看（拉伊经常那么做），图像模糊不清，就像镇上唯一的那家报纸上满是黑点点的照片一样。门框上方用粗黑的字体刻着一句古老的印第安人箴言——“别撒谎，别杀戮，别……”——醒目得与这座死气沉沉的监狱毫不相配。拉伊喜欢这座监狱：他喜欢坐在他叔叔旁边——叔叔的差事似乎不外乎等着乱子出现。听特里尼说，乱子太少了。他恨恨地抱怨镇子太安静，总喜欢叨叨他住在首都那年的故事。你根本无法知道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听特里尼说的，城里住的都是小偷、乡巴佬和杀人犯，谁也不比谁少。听特里尼说的，他从来就是一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单枪匹马讨公道的人。那个大闹市！让人难以想象：一个破败不堪的地方，即使在那时，就已经摇摇欲坠，阴森可怖。但是它究竟是个什么样？拉伊说不上来：沸腾、黑色的海洋，锯齿状的海岸线和滚滚乌云，永远被黑暗笼罩着的成千上百万居民。而这里是明媚的阳光和真正白雪皑皑的山峰。这里有蔚蓝色的天空、蜿蜒盘旋的河流和鹅卵石铺成的广场以及其间水流潺潺的喷泉。情人们手挽手地倚在公园长凳上，市政府栽种的花坛上鲜花开放，街道上可以闻到清晨刚出炉的面包的香甜味道。拉伊家乡小镇以广场为中心有方圆 10 个街区那么大，再往外走便是土路和灌溉过的田地以及一座座带红色茅草屋顶的农房。特里尼描绘的是一个拉伊无法想象的地方：一座在繁华中衰败的城市，既有霓虹灯和钻石交相辉映，又有刀光剑影和炙手的金钱，既光彩夺目又肮脏龌龊。

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团(HarperCollins Publishers)2007 年版权所有，经许可转载。保留一切权利。

捕捉云朵

黛安娜·阿布杰比

黛安娜·阿布杰比（Diana Abu-Jaber）是《新月》（Crescent）（2003 年）的作者，获得 2004 年国际笔会美国中心文学小说奖（PEN Center USA Award for Literary Fiction），以及哥伦布前基金会美国图书奖（Before Columbus Foundation's American Book Award）；作品包括《阿拉伯人爵士》（Arabian Jazz）（2003 年）和《巴克拉瓦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the Baklava）（2005 年）。她的最新一部小说是《身世》（Origin）（2007 年）。她现任俄勒冈州波特兰州立大学（Portland State University）英语系副教授。

几年前，我决定要写点“真实”的东西。我想写一部我在美籍阿拉伯人家庭成长的回忆录。但是不知为何，就在即将下笔的时候，我却感到无言：字枯词穷。此时我已经有很长时间的写小说经历。但是，当我挣扎着描写过去的时候，当我试图用手去触摸童年时光、家庭聚餐、交谈和旅行的记忆感觉时，一切似乎都在逃避我；犹如极力用捕蝶网采集云朵一般。

我在美国出生长大，但由于血统的缘故，我经常被问起对中东的看法——好像我是某种社会学家或政治学者。实际上，我是一个小说家——我喜欢在脑海中虚构关于个人的一些奇特的、非成规界定的故事，而不是描述历史或文化的轨迹。

但是美国人热爱“文化”——我们渴望建立一种与比自身更大、更古老的事物相关联的感觉。这里的大多数人都来自其它地方，他们相互通婚，不记得自己祖上的血统来源。就我个人来说，我父亲有着可以上溯数百年的贝都因（Bedouin）血统，而我母亲仅仅知道她的祖父母分别是爱尔兰人（Irish）和巴伐利亚人（Bavarian），或者可能是荷兰人（Dutch）或瑞士人（Swiss）——但不是十分确定。我和姐妹们在美国长大时，爸爸经常提醒我们对某些东西不要糊涂——那就是我们实际上是阿拉伯（Arab）女孩。优秀、顺从的约旦（Jordanian）女孩。

我对父亲的文化的了解来自纽约州锡拉丘兹的美籍阿拉伯人社团的耳濡目染。我们喜欢吃的果仁蜜饼是我们开朗的胖胖的巴勒斯坦邻居做的；我们的阿拉伯语老师是一位一脸严肃的伊拉克迦勒底人，课堂设在一个潮湿的希腊东正教教堂的地下室；我们的舞蹈老师是一位有着明媚笑容的埃及女人。父亲偶尔会展开他那可爱的旧丝绸祈福毯祈福，但我们每个周日都会在外婆的大天主教堂里做弥撒。这种“文化”与父亲的约旦河谷的传统教育有着光年般的距离。

我白皙的皮肤也于澄清事情毫无助益。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注意到我们的那些约旦亲戚在我们玩耍的时候偷窥我们，包括我以及我的姐妹、表兄妹；他们会相互低语:“那就是她——那个是美国人！”即使是在当年，我也能感觉到那是一种有差别和异样的说法——意味着某种尊贵但却属于另类。他们称我的有着橄榄色皮肤的姐姐为“阿拉

伯人”。美国人也经常会觉得必须让我知道我长得不“阿拉伯”，仿佛削弱了我认为自己是美籍阿拉伯人的权利。我讨厌那样，厌恶人们基于我的相貌就认为他们知道我是谁或者我怎么想。

高中的一天，一位好心的老师要上一节她称为“种族认同”的课，她试着做了个实验。这位苗条金发的哈罗（Harrow） Harrow 夫人靠着桌子对学生说，认为自己是“有色人种”的去教室右边，认为自己是“白种人”的去教室左边。令我吃惊的是，全班很容易很自然地分成了两部分……只剩下我自己坐在教室中间。说实话我是不知道我属于哪一边。班上的大多数人似乎意识到这种滑稽，老师却很生气，好像我是故意装傻。显然哈罗夫人从不曾知道存在着这样一种情况，即自己看待自己的方式与他人眼中看到的自己不一致。我只能羡慕她那种简单的和谐一致——如果与别人对你的看法一致该是多么好。

幸运的是，美国如此广大，人们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发现自我。很多移民通过聚会、部落汇集找到自己的小天地：韩国城、意大利街区和小海地。在我成长的年月里，没有足够数量约旦人形成自己的独特小区，因此我们周围住着各式各样的人家和朋友——通常是来自各个不同阿拉伯国家的新移民——偶尔甚至包括从意大利、土耳其和希腊来的旅行者。食品与宗教是否完全一样似乎并没有共同具有的情感来得重要——一种更缓慢的节奏、一种相互交谈的激情、一种严格的道德规范、一种对孩子的宠爱。

我的童年世界大致可分为两部分：内部（“阿拉伯人”和朋友）和外部（“美国人”）。当然，人们不能过于严格地检验这一划分，否则它会分崩离析。例如，我父亲和他的兄弟们都娶了美国人。然而每个周末我们都会在家举办闲散的全天聚会，充满了阿拉伯的传统食品、音乐，以及大多用阿拉伯语进行的、大多涉及政治的高谈阔论。对一个孩子来说，在周末（喧哗、有趣、激动、吓人）与平日（平静、有效、些许无聊）之间的这种不协调，如同是不断受到的文化冲击演练。从父母的聚会中我懂得，吐露“真相” ——关于自己的欲望、恐惧和信仰的个人真实想法——是在这片美国荒原上任何一个人可能作出的最可怕和最冒险的事。

父亲似乎在每个星期一转变，从一个喧哗和观点鲜明的厨师变成一个更为谨慎的一本正经的办公室经理。我怀疑他是否坦率地与他的同事交流过他的看法，尽管他一回到家，经常对同事们对于中东地区的无知怒发冲冠。他的美国熟人似乎不会有一个人知道他有开一家自己的餐馆或与我们一起回约旦的愿望。他们只认识一个经过仔细装饰的人格。我所认识的移民们似乎都认为，美国是一个获得教育和发展事业的好地方，但美国人也有一点危险、疯狂和靠不住。你对他们说每一个字都要认真斟酌。

似乎无法判断一个美国人——特别是一个美国男孩——会做出什么行为。父亲在有了三个女儿——人们称呼我们为他的“后宫”—— 后，格外加重了这种感觉。父亲说，当地的男孩子都有可能是暴力的性欲狂人和酗酒吸毒者。显然，美国的女孩子要安全一点，但是我的朋友们对他们父母的无礼和叛逆往往使我感到震惊。我惊奇于朋友们轻易地吐露自己对各种私事的看法——如此坦率地谈论她们的男朋友、家庭和理想。我钦佩她们

有自信地认为即使她们的看法得不到赞同，也起码会得到接受。我在世界上看不到这种信念——不论是阿拉伯还是美国。看晚间新闻更突出了这点。Walter Cronkite 沃尔特·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美国著名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译注）会谈一件事——关于越南或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或中东，而我的父亲会以不同的信息和观点作出激烈反应。我通过新闻再次懂得，世界划分为不同部分。内部的人（美国人）总是对的，外部的人（其他所有人）实际上无足轻重。但是当然，对于移民的孩子——在一个移民国度——来说，其问题在于要真正弄明白内部的人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人。

我发现，要把握一种独特的文化体验有一点像直视浮在眼睛表面上的东西。我试图理清，除去语言和地域这种明显事实外，是否还存在一些东西能够使一个人的经历具有“美籍阿拉伯人”的独特之处。为文化认同与自我伸张而进行的斗争，在保留传统与迎接拥抱新事物间的对立矛盾，都是美籍阿拉伯人社区所面临的真实问题。但是，它们也是来自四面八方的各种移民的共同问题。

成年人以后，我开始意识到，美籍阿拉伯人的经历所涉及的与其说是阿拉伯世界自身固有的东西，不如说是美国对“阿拉伯特性”的认知和反应方式。因此，个人文化身份与公开文化身份之间的搏斗成为我的回忆录的主题之一。我的草稿写了扔，扔了又写，不断和我自己、我支离破碎的记忆、我困惑的情感反应较劲。我通过层层支离破碎的形象、谈话和实物（如食谱），逐渐形成叙事结构。

我拒绝向任何人展示手稿，因为我不能克服我自己对透露真情所具有的小心习得而来的、高度敬畏的恐惧。我担心如果我家里有一个人反对，我可能就什么都无法写出来 。于是，在经过三年的改写和自我反省后、在我最终交出我希望能被我的经纪人接受的草稿后，她把草稿退给了我，并说：“重新写。这次告诉我们你所没有写出的话。”

我几乎想彻底放弃这个项目。我开始认为，我受到家里人过度的保护，我受到对故国的家人和对美国艺术双重忠诚的太强烈的煎熬，无法真正说出我没有说出的话。在绝望之中，我向母亲作了倾诉，告诉她我在为写回忆录苦恼、我害怕写错、害怕伤害他人。在深思地停顿了一会儿以后，温和的、说话轻声细语的当小学老师的母亲终于开口：“亲爱的，我理解你希望敬重为人，不想伤害任何人。我知道你爱家里人，想在每个人面前都做得好。但是，归根结底，你知道我说什么吗？我说：如果任何人不喜欢它，那就见鬼去吧！”

啊。我惊得无言以对。而后，震惊转化成欣慰。我的美国母亲给了我那一点点额外的信心、最终让我相信，我有权利拥有自身的经历并予以公开表达。我又一次开始了写作。一年之后《巴克拉瓦的语言》问世。

人们常常问我为什么不多写点我的母亲。实情是，父亲是个较好写的主题。虽然我不知道是因为他的文化差异，还仅仅是因为他的性格，但他比我见过的任何人都滑稽、大嗓门和奇特。然而同时，我绝对相信，没有我母亲的榜样，我永远不可能成为作家。即使

她没有不寻常的家庭背景，即使她喜欢听所有美国人都喜欢听的歌曲，即使她不痴迷于烹饪或政治——她来自哪个国家无关紧要：她细心体贴、尊重人并充满智慧。她给我买书；她问我有关我的情况；她教我如何倾听和观察，如何思考与阅读。

在《巴克拉瓦的语言》出版后，我发现我想更深地了解我的美国背景，于是，我写了《身世》。这是一部谋杀悬念小说，主角是一个在锡拉丘斯长大的孤儿，对她生身父母亲的情况一无所知。这本书不同于我以前所写的书，仅就其新形式而言，就令我深感满意。

这并不意味我正在放弃或不再想探讨我的约旦之根，而只不过是像所有作家一样，我需要不断鞭策我自己向前发展，采用发现和描述我的真情的新方法。任何作家最大的心愿和特权也许就是成为艺术完全自由的推动者，拥有虚构再创作的权利。从很多方面而言，尽管我成长过程中有时受到限制，但现在我很高兴我有两种文化，它不仅仅扩大了我的世界意识，而且磨练了我自己。因为有些时候，我认为最好不要什么都说；有些时候，给事情留点时间让其在沉默和思考中演化是有利的。

我最近在纽约的一个小书店里做朗读。在朗读后的问答过程中，听众中的一位妇女赞成地点头并告诉我："你的写作像阿拉伯人"。

尽管我至今不能完全确定她的话的含义——那个故事是关于美国的人物并且当然是用英语写成——但我仍然因为有了一种受到肯定和被接受的感觉而得到一种奇妙的满足。在多年无所适从之后，好像终于得到了一种认可。

我笑了笑，并最真诚地向她说："谢谢您。"

以族裔的多棱视角写作

波西丝·卡里姆

波西丝·卡里姆（Persis Karim）是出生在美国的诗人，也是文选集《让我告诉你我去过什么地方：伊朗海外女性新作〈（Let Me Tell You Where I’ve Been: New Writing by Women of the Iranian Diaspora）（2006 年）》的编辑。她是《夹缝中的世界：伊朗裔美国人的诗歌、短篇小说和散文》（A World Between: Poems, Short Stories, and Essays by Iranian-Americans》（1999 年）》的编辑和著者之一。目前她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市的圣何塞州立大学（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任英文和比较文学副教授。

作为一个美国人特别之处在于，它真正让你接触全世界。身为二次世界大战后移民的孩子，我在成长过程中感觉到美国是一个机遇和安全之地，对我的父母而言，选择成为美国人同时意味着同时享有权利与义务。我父亲是一位目睹了自己的国家因发现石油和冷战政治而发生巨变的伊朗人，来到美国代表着他个人发展机会和目标的重生与再创。父亲有过在战争中在苏联和英国军队占领下生活的经历，这使他对国家和自身的命运作了很多思考。他年轻时阅读了体现在美国宪法中的有关美国民主的理想，并接触到这样一个观点：对于那些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统治结束后感到受民族国家政治所限的人们来说，美国应该是他们的目的地。我母亲是在法国经历了战争及被占领的移民，她在战争后期教美国军人学法语期间，对他们所体现的生气勃勃的美国精神略见一斑，她相信美国是她与这种精神的重逢之地。对我的双亲而言，美国有着让他们能够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的梦一般的诱惑力。他们踏上美国这片土地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偶然性，但是在此定居并成为美国人的打算则出于深思熟虑。

我在北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以昂格鲁撒克逊白人为主的社区长大，对我自己的身份认同有着复杂的感觉。不知不觉中，我在努力把自己当成加利福尼亚人和美国人。但是我在小时候，就已经强烈意识到自己的不同。我家并没有处在伊朗人或是法国人社区，周围也没有亲戚，但我仍然感觉到族裔特征。也许是我的名字，我的长相，我们吃的食物（大量的米饭和羊肉）；但也有可能，是我自己明确地受到“另类”这一观念的强烈吸引，而且，随着我对世界时事更有了解，这种吸引力愈发强烈。越南战争首次使我意识到美国之外的世界，但是，让我对自己的伊朗裔美国人身份猛然有了更明确意识的是越战之后的一些事件。

二十世纪 70 年代，随着美国在中东政治中开始扮演越来越活跃和明显的角色，我对伊朗的好奇心也更加强烈。到我上中学时，伊朗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议题。我父亲因为美国在 1953 年支持对民选产生的伊朗首相穆罕默德·摩萨德（Mohammed Mossadegh）发动政变已经感到非常失望，在我青少年期时，他开始对美国在他的故国所起的作用提出更公开更多的批评。尽管我还没有特定的政治观点，并且对伊朗的了解非常有限，但我开始对做美国人意味着什么提出疑问。大约在 1979 年美国人质危机和伊朗革

命爆发时，我开始了对我父亲的家事渊源的探索，并越来越感到需要了解和探究我自己的这部分身份来源。

文学和写作向我提供了了解伊朗传统的最重要窗口。小时候，父亲和我分享他对诗歌的热爱。他用英语和波斯语高声朗诵不仅英国和欧洲诗人——如波特莱尔（Baudelaire）、雪莱（Shelley）和莎士比亚（Shakespeare ）——的作品，也朗诵伟大波斯诗人海菲兹（Hafez）、鲁米（Rumi）和 海亚姆（Khayyam）的诗歌。他对文学和阅读的热爱具有感染力，成为我满足自己对伊朗和伊朗文学日益增长的好奇心的最重要途径。那时，伊朗陷入混乱，美国媒体有关伊朗和伊朗人的报道负面尖刻。甚至流行文化对中东都很刻薄。“骆驼骑师” （Camel Jockey）和调幅电台的热门歌曲“Ahab the A-rab”是我青少年时代人们通用的绰号。作为一个青少年，我想为我父亲的国家和人民辩护，抗议将他们指控为“激进分子、恐怖分子、扣押人质者”。在学校、城市街道和电视新闻节目上，我四周的人都在高呼“轰炸伊朗”和“伊朗人滚回去！”

在家里我听父亲对发生在德黑兰的政治事件作出更为尖锐和复杂的分析。我开始明白，发生在那里的事件既是少数激进分子扣押美国大使馆人质所导致的后果，同时也是我的国家——美国——所制造的问题的结果。这些事件以及媒体对于伊朗过于简单化的描述，令我对那个国家发生的事情感到更加好奇。我没有在针对伊朗移民社区的愤怒和敌意面前畏缩，而是更加认真坚定地了解伊朗和自己的伊朗背景。在整个探索过程中，包括过去和现在，我始终都回归到文学和作家享有的代表力中。慢慢地，我开始感到我对自己的混血和移民背景形成了第一人称所有权。那时，我产生了要写下“我们的”叙事，讲述“我们的故事”的冲动。在革命、人质危机和伊朗/伊拉克战争这些事件发生时，在美国人头脑中对伊朗的负面印象越发根深蒂固时，帮助讲述仍在不断扩大的美国伊朗移民社区的历程，逐渐成为我的使命。通过探讨伊朗和伊朗文化对我这个作家和美国公民的种种影响，我开始走上申明我的伊朗特征的旅程。

作为一个作家，我开始认识到表述我的复杂而微妙的非纯美国特征的重要意义——甚至是优越性。我希望掌握和发展一种属于我成长年代的作家的视角和声音。我也希望写出我的家庭背景和与众不同是怎样从多方面使我受益，将我推入了一个自我界定的过程。这是一种只在美国才有可能的自我界定，因为在美国，自我界定不是一种静态宣言，而是一个动态过程，不断地受到作为每个美国人生活结构一部分的更宽阔的政治和文化对话的影响。美国读者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才开始认识到伊朗移民经历的复杂、艰辛和美好以及描述这些经历的文学作品。年轻而朝气蓬勃的海外伊朗人文学终于形成了。但是，这种伊朗-美国文学情结由于第一代伊朗移民的失落感和流离失所，也由于认识到移民海外为正在成长起来的第二代创造的种种可能而减退。伊朗裔美国人非常珍视言论自由和创造新文学文化的机会，新文学包含历来受到伊朗传统文学排斥和限制的作家，例如：；妇女、宗教、文化少数民族和持不同政见者。

在我自己的写作历程上，我努力找出并连接我的多元背景中的千丝万缕的关系。我得益于父母亲的美国历程上的丰富经历，它是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无数个意外的巧合结果

之一。二战给世界每一地理和政治角落带来政府更迭，而它产生的阵阵涟漪，不断波及千百万人，包括最终导致我的父母：两人都在感到这里存在巨大希望与机遇的时刻，从各自的家园来到了芝加哥的同一舞厅。作为作家，我深信这样一种意识，那就是，移民的子女不仅应该像在这块大陆出生的孩子、而且也应该向来自其他大陆的孩子一样，讲述自己的故事。我相信我具备成为美国作家的条件，而这一信念对于我运用表达自己的机会具有重大影响。我认识到，一个人如果生活在美国，就不能忽视这个国家的文化和政治实力对世界产生的重要有益或无益的影响。然而，我也清楚，我们必须继续牢记这一点：我们是一个年轻的国家，深切地关注自身成长。在这样的环境中，写自己的身世背景只是开端。我愿意认为，我父母的经历已经深深扎根于我的心中，激励我讲述了他们艰辛的生命历程中的故事；但是，我作为作家的角色是要超越他们的故事，超越我所继承的任何族裔文化，进而创造新篇章。

我认为，我现在正在做的事情——身为作家、诗人和编辑——是我的混血美国人特征的最佳体现。我记述了在一系列历史的偶然和我父母生活中的偶然中我的发展，与此同时，我的作品也深思和融会着作为我们美国特征的重要特色的能动精神。这一特征犹如粘合剂，给这个国家以某种社会整体感，但是它同时又形成缝隙，使新观点和声音得以从边缘渗入中心。尽管我的作品不总是有意识地源于这些缝隙，但这些内容绝不可少，是展示我身为美国人和混血美国人的特征的最佳效应所在。

一位印度裔作家的经历

阿基尔•夏尔马

阿基尔·夏尔马(Akhil Sharma)的第一部作品《顺从的父亲》(An Obedient Father)分别荣获2000年笔会海明威奖以及2001年怀廷作家奖。夏尔马的短篇小说见诸于《纽约客》、《大西洋月刊》等刊物。2007年，他还登上英国《格兰塔》杂志评选出的美国最佳青年小说家排行榜。

我只能谈一下自身经历，不宜认为我代表所有美国印度裔作家。

我在九年级时开始写短篇小说，原因是我当时非常沮丧失落，渴望得到关注。

我们家于1979年迁移来美，同行的有我和我的兄长阿奴普及我们的父母亲。两年后，阿奴普在游泳池出了事故，大脑受到严重损伤。当时他十四岁，我十岁。

阿奴普还活着，但不能行走，也不能说话。他不能通过嘴进食，因此必须通过一根胃管将食物从右肋骨下输入胃里。阿奴普睡觉时不能自动翻身，彻夜得有人在身边陪着，每两小时一次将他从一侧翻动到另一侧，以防生褥疮。

那次事故后的两年中，阿奴普一直在医院度过，后来我父母决定自己照料他。他们将他接回家中，并雇了护士。除了为哥哥的病况担忧外，我少年时代的另一极度忧虑是钱的问题。我们家经济很紧张，要依赖保险公司和护士，所以我们觉得我们总遭人背弃，没有人在履行责任。有许多次，我们的护士说，她们会来家里，从某一天开始值班，但她们就是不来。另外，由于家里有陌生人，我们也总是担心有人会偷东西。有一个护士竟然偷走了母亲从跳蚤市场买回的玩具熊。

在读九年级前，我已满15岁，我只是在学校布置作业时才写过短篇小说。但进入九年级，我有一位老师，格林夫人，她夸奖我对阅读材料理解得很深刻，为了博得她更多的好感，我开始主动写短篇小说。

最初我写的所有短篇都是以美国白人为主人公。我想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读的所有小说均是描绘白人的。另一方面，我觉得一个美籍印度人的经历无关紧要。 作为少数民族，与主流社会的生活相去甚远，我觉得自己的经历不入主流，自然不如白人的经历那么重要。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自己的经历由于无人分享，甚至不如白人的经历那么真实。

我在写作白人生活时遇到的困难之一，就是我对白人一无所知。只是在十年级时，我才第一次去白人家里。

十年级时，我读了海明威的传记。记得是在一个早晨，我开始伏在餐桌旁读海明威，厨房的窗户一片漆黑。我之所以读海明威传记，是因为能向别人吹牛，说自己读了海明威的小说。(我过去总喜欢吹牛，声称自己读了实际上并没有读过的书。)

我读了这本书后，感触很深。海明威曾在法国和西班牙生活，他还去过古巴，似乎有着美满的一生， 这一切是多么神奇。在这之前，我一直琢磨以后要做一名电脑程序员、工程师或者医生。读着海明威，我猛然感到自己可以像海明威那样生活，而不必庸庸碌碌地过日子。

读完海明威传记之后，我开始看其他介绍他的书。我看了更多的传记和评论文集。在真正读海明威的作品前，我可能读了 20 本介绍他的书。我之所以读关于他的书，是因为我想知道如何走他的路，我不希望遗漏任何线索。最初，我对海明威的作品本身并无多大兴趣。

我认为海明威对我的写作影响最深。或许你已经知道，在美国读者看来，海明威笔下的人物充满异国情调。他描绘的人物有意大利的黑帮和士兵以及巴黎的新闻记者。海明威给我带来许多启示，我想我之所以成为作家，几乎完全是始于海明威，也可说是对海明威的回应。其中一个启示是，你可描写异域生活但又不至于陷入一味追求异国情调之中。研究海明威的学者强调，他的短篇小说在情节进行中开始，仿佛读者已对他所描绘的背景非常熟习，当他做出直接解释时，就突破了虚构经验的现实，仿佛是在对读者表明，我打破这一小说传统，是因为我不想说谎。

我学习写作是从模仿海明威开始的，在上大学前我的确没有读过非白人作家。那时，我总认为写作就是写作。文学不过是通过一串词语和一系列手法在读者内心产生共鸣。我始终认为，对外科医生而言种族并不重要，因为无论病人是何种族，心脏和胆囊仍是心脏和胆囊，作家也是如此。

我来美国时，正赶上移民大潮。这一亚洲移民浪潮激起美国社会的好奇，人们想知道生活在亚裔家庭是什么滋味。我感到庆幸的是，我的作品有人读。(我自认为是一位优秀作家，但我设想如果我 50 年前就在写作，那么我的作品可能会太具异国情调，太边缘化，以致不值得普通读者阅读。)

我的第一部作品获得笔会海明威奖。该奖颁发给一年中出版的最佳处女小说。

为我颁奖的人是海明威的一个儿子。我想是帕特里克·海明威。这位白发绅士和我在会议室里交谈了 10 到 15 分钟。我当时有些紧张，没有告诉他他父亲对我的影响是多么巨大。我们谈的是他父亲从《祷语汇编》（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中为作品寻找书名的往事。

有时，当我想起自己多么幸运，就禁不住想哭。

对我写作产生影响的因素

塔米姆·安萨里

塔米姆·安萨里(Tamim Ansary)是《喀布尔以西，纽约以东》（West of Kabul, East of New York）的作者，也是美国连续运作时间最长、历史最悠久的免费旧金山作家工作坊（ San Francisco Writers Workshop）的指导人。他从事有关阿富汗、伊斯兰教史、民主、和文学创作等问题的写作和讲学。

当我回想影响我写作的因素时，我发现它们主要都是口述来源。我出生在一个有着写诗、讲故事、神话和哲学传统的家庭，而这些内容可以追溯到一千年前赫拉特(Herat)的霍贾·阿卜杜拉·安萨里（Khwadja Abdullah Ansary）。尽管小时候我从未读过祖先的著作，但我听到了他们的话语，领会到从我父亲、兄长、堂兄和朋友们的交谈中散发出的这些作品的精神。他们每天都会聚集在一起一边吟诗造句，一边无休止地喝茶，一边讨论深奥的问题；而我则靠在离我父亲不远的地上，不声不响地倾听一切。

我是在家中故事能手身边长大的，祖母 K’koh 是他们当中的最高手。她从没上过一天学，甚至不知道怎么写自己的名字，但是却能够为我们讲述整个宇宙的故事——那里居住着巨人和魔师，鬼怪精灵与英雄豪杰在仙境中遨游驰骋， 树上会挂满眼球，骏马飞翔，并随后化为一团火球。祖母像来自黑夜中的声音，令我们这些小孩子像小狗似的挤靠成一堆，屏气聆听。

对这些故事我百听不厌——名副其实是这样：成年人不多而且他们太忙，根本满足不了我的渴望，于是我开始编织自己的故事。

当我学会读书的时候，我便利用这个工具闯进了另一个宝库，那就是《百科知识》（The Book of Knowledge）。它是一套 20 集插图儿童百科全书。每天，当大人去上学或上班以后，我就一集集地翻阅这套书，知道了星星是怎样形成的，是谁建造了金字塔，如何区分印度大象和非洲大象，等等。而当大人回来时，我就迫不及待地讲给他们听。

我今天所写的一切都追溯到这些最早的源头。我现在还在研读百科知识，还会兴致勃勃地告诉人们我学到了什么，还是试图重现来自黑暗中的声音，记述历史征程，展示骏马奔腾；我也仍然沉醉于我父亲和他的同伴们的谈话中，所不同的是，我现在已经升到桌边，而这张桌子连接全球，声音也从多种媒体传出，我们大家都在苦苦解析这个世界，相互讲述被我们揭开的这个世界的秘密。

《六十九美分》

加里·施藤加特

加里·施藤加特（Gary Shteyngart）出生于列宁格勒，七岁时移民来美。他的《荒诞斯坦》（2006 年）一书被《纽约时报》和《时代杂志》等主要报刊评为年度十佳作品之一。他在 2003 年出版的第一部小说《俄罗斯社交圈女士入门手册》（The Russian Debutante's Handbook）荣获斯蒂芬·克兰第一部小说奖，2007 年他还被《格兰塔》（Granta）评为美国最佳青年小说家之一。他目前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写作系任助理教授。

十四岁那年，我褪去了俄罗斯口音。我基本上能迎头走向一位姑娘，道声“喂，你好”， 但不会听起来像 Okht Hyzer，那很可能是一位土耳其政治家的名字。经过这番脱胎换骨，我有三个愿望：南下佛罗里达，我想美国最优秀最聪明的佼佼者在那个有着漫长沙滩的地方，为自己营造了五毒俱全的天堂。其二，能有个姑娘，最好是土生土长的，告诉我她对我情有独钟；其三，一日三餐都吃在麦当劳。那时我们的家境不好，不能常上麦当劳。父母大人认为，到外面上馆子、或不是在果园街上购买按斤论价的衣服，就是阔富人家或挥霍之徒干的事，或许也是我们常在电视上听到的那些奢侈的“福利女皇”喜于做的。不过，即使是如我父母这般盲目迷恋美国的移民，也抵挡不住佛罗里达那魔幻般的吸引力，经不起海滩和迪斯尼乐园米老鼠的诱惑。

于是，在我就读的希伯来语学校放寒假期间，两家俄罗斯人挤上一辆旧车，沿着 95 号州际公路，往阳光州直奔。另一家子，一共三人，跟我们一样，不过他们唯一的后代是一个女孩，并且他们的体型比较硕大。而我们全家合起来不过三百磅重。我们在明日实验模型区中心（EPCOT Center）单轨火车站下留了影。我们大家各做出不同微笑，脚踏实地地驻足于我们这个新国家中最受欢迎的名胜，我们流露出似曾相识的感觉。我本人的微笑则特夸张，宛如上世纪末一个犹太小贩在人行道上冲着一桩可能的买卖紧追不舍。我们的迪斯尼门票是免费的，但我们必须听取一场奥兰多分时度假别墅的推销广告。

分时度假别墅的推销员一边掂量着我父亲刻意做出的风度，一边发问，

“你是莫斯科人吗？”

“我是列宁格勒人。”

“让我猜猜：你是机械工程师吗？”

“是的，是机械工程师……对了，请发迪斯尼门票。”

当我们的车穿越麦克阿瑟海湾大道来到迈阿密海滩时，我方觉这才是我真正的入籍仪式。我渴望拥有眼前的一切：婆娑的棕榈树、在气派的大豪宅旁拍打着湾流的游艇、倒

映在楼下碧绿的游泳池中的钢筋玻璃公寓、以及可能与风尘女子产生淡淡的幽情。我仿佛觉得自己站立在那阳台上，吃着巨无霸，随意从身后将薯条抛入泛着海水咸味的空中。不过，我得等候。我父母预定的旅店没有普通床，有的只是行军床，一只半尺长的蟑螂长得很是生猛，仿佛在向我们飞舞着拳头。我们慌忙间逃出了迈阿密海滩城，北上了劳德代尔堡。一名南斯拉夫妇女将我们安排在一家破旧的汽车旅馆，离海滩不远，而且提供免费的超高频服务。我们似乎总是处于边缘：走在希尔顿枫丹白鹭酒店的车道旁，或是乘坐玻璃电梯上了屋顶餐馆，暂时隔着“请恭候”的牌子往下瞅两眼浩瀚的大海，我们告别的旧世界显得如此遥远但又仿佛近在咫尺。

对于我们父母和他们的好友而言，这家南斯拉夫人开办的汽车旅店无疑是人间天堂，在走过一段艰辛的人生之后，可在此歇息喘气，不失为一幸。我父亲穿着红黑相间的冒牌速比涛（Speedo）牌泳衣，悠扬自得地躺在阳光下，我则在沙滩上溜达，从那些正在暴晒的中西部姑娘身旁走过， 道声“喂，你好”。这声吐词，听似地道的美国味，却不是与生俱来，而是后天学成，它们出自我唇齿之间，然而向其中某位姑娘迎头走去，随意打声招呼，则需要在脚下那片热土沙滩扎根站稳，需要的是历史的底蕴，比印有我指纹和布满雀斑的面孔的那张绿卡更厚实。回到旅店，73 频道或 31 频道或其他某一黄金频道正在不断重播《星际迷航》，那些褪色影片中的星球比我们自身世界更令我感到亲切。

在驱车回纽约的路上，我全身贯注地在听“随身听”，希望将这一度假忘却。当车经过佐治亚州南部后，棕榈树已渐渐淡出，我们在一家麦当劳歇脚。我已垂涎欲滴：我渴望那六十九美分的汉堡包。那红得发紫的番茄酱上点缀着细小的洋葱碎末。开胃的泡菜丝，清新的可乐哗哗流泄，汽水在喉咙中哗然而至，这一切完成得痛快。我跑进这神奇地方，凉丝丝的肉香味扑面而来，而我身后跟着俄罗斯大人，他们托着一只红色大箱。原来是冷藏箱，我们离开旅店时，同行那家的女主人将箱子塞得满满的，她颇似我母亲，园园的脸蛋，待人友善。她为我们准备了一顿丰盛的俄式午餐。有锡皮纸包好的水煮鸡蛋；用过的酸奶盒子装满了俄罗斯甜菜色拉“vinigret”；凉拌鸡肉镶嵌着一层一层的白色香脆 bulka。我央求道：“这里不让带吃。我们必须买他们的。”

我顿感一阵发冷，当然不是佐治亚州南部空调冷气的缘故，而是源自身体的寒冷，就宛如人死时的感觉，万念俱灰。我在一张桌子旁落座，尽量远离我父母和他们的朋友。我观看着刚晒黑的绿卡居民在吃自己本民族特色的午餐时的那一壮观场面，他们的下巴不断地活动着，水煮鸡蛋在入口时发出微微的悸动。与我同龄的那位女孩像我一样也郁郁寡欢，不过显得几分乖顺平静。她父母在一旁正用塑料勺子将甜菜块清扫掉，我父母则起身准备使用麦当劳免费餐巾纸和吸管。美国出游开车人，拖家带小，他们的孩子一头黄毛，闹哄哄的，大人则为他们买他们最开心的午餐。

我父母笑我太傲慢固执。我则坐在那里饥肠辘辘，没人理睬，我此刻正变成一个陌生人！我是如此与众不同。我的口袋装满了两毛五和一毛钱的硬币，足够买一个汉堡包和一小罐可乐。我正在想是否要理直气壮，抛弃我们那甜菜色拉的传统。我父母不愿花钱，原来他们忧心重重，担心肝功能检查结果上标有医生的紧急提示，他们还害怕丢了饭碗，

因为他们英文不好。我们只是影子社会的芸芸众生，畏缩在永未实现的不测风云背后。我那白花花的硬币没有溜出口袋，我的怨恨压抑了下来，扩展成日后的某种溃疡。我毕竟是我父母的儿子。

本文版权由作者拥有。文章最初发表于《纽约客》杂志，重印获得丹尼斯香农文学代理所的许可。

我的文学之恋

拉拉·瓦彭亚

拉拉·瓦彭亚（Lara Vapnyar）1994 年从俄罗斯移民到纽约，2002 年开始用英文发表短篇小说。她著有两部短篇小说集《食品与爱情故事·西兰花和其他》（2008）和《我家有犹太人》（2004），以及长篇小说《女神回忆录》（2006）。

少女时代的我，对一拨儿作家有过一连串文学迷恋。我从书架上取下一本书，就会立刻如痴如醉。整个夏天，我会只读果戈理并声称他是俄罗斯最伟大的作家，但到了 9 月份，我又转向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两个月后又会弃他而去，另有所爱，或者又会重拾果戈理。我会迷恋上一位位作家，但不一定是我酷爱其作品的作家。有些作家是我非常敬佩的，但却谈不上喜爱。托尔斯泰便是一例。他时不时要进行说教。我读他的小说时，常有这样的幻觉，仿佛看到他像一个令人心烦的家长那样居高临下。我不禁要说，“噢，让我安静一会儿吧，让我好好读读这本书。”

契诃夫是我喜爱时间最长也是最令我执著的作家。我记不清我最初喜欢上的是他的短篇小说，还是扉页上的作者肖像：两者均是那么完美。他的短篇细腻而明快，但又庄重，非常庄重。作品既伤悲又诙谐，诙谐得不失偏颇。作品引人发笑但并不流俗：契诃夫要求读者自己寻找幽默。然而，契诃夫最显著的特点便是他善于不动声色地使读者顿开茅塞，使他们看到始终存在但却从未得到发掘的生活。他能让读者扼腕叫绝。

我与契诃夫笔下的每一个人物都能产生共鸣。我就是古罗夫；我就是安娜·谢尔盖维纳；我就是马戏犬卡什坦卡。这是一个完美、一帆风顺的爱情故事，不过当我读了《罗特席尔德的提琴》，我的感觉却发生了变化。作品并非如标题所示，它描绘的不是罗特席尔德而是雅科夫,一个俄罗斯殡仪员。罗特席尔德在作品中只是一个小人物，一个不起眼的犹太人----并非坏人，却是一个荒诞的可怜虫。这是契诃夫笔下的一个我本不愿认同，但又不禁想要认同的人物。他是一个犹太人，正如我本人一样。我在契诃夫的作品中还发现了其他许多犹太人物。他们绝不是恶人，但他们无疑渺小且胸无大志。这就是契诃夫笔下的犹太人形象。

后来我移民来美并开始从事写作，这两件事几乎是同时发生的。我开始对美国当代作家发生兴趣，特别是对那些像我一样来自异邦的移民作家。我羡慕琼帕·拉希莉（Jhumpa Lahiri）那典雅、宁静而深邃的风格、朱诺·迪亚兹（Junot Díaz）的激情和活力以及亚历山大·埃蒙（Alexander Hemon）那大胆的试验风格。当我文笔枯竭时，我会从他们的作品中寻找灵感；当我的个人生活遇到挫折时，我会从他们笔下的人物那里寻找慰籍。

然而，契诃夫无疑仍是我人生中的文学挚爱。我的床头柜上摆着他的书，我时常翻阅着它们，提醒自己：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如此简洁而质朴，却足以洞见真正的伟大。

相关资料

---当代美国多元文化文学

相关读物

Bloom, Harold, ed. Asian-American Writers. New York: Chelsea House, 2009.

Bona, Mary Jo and Irma Maini, eds. Multiethnic Literature and Canon Debate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6.

Botelho, Maria J. and Masha K. Rudman. Critical Multicultural Analysis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Mirrors, Windows and Doors.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Cutter, Martha J. Lost and Found in Translation: Contemporary Ethnic American Writing and 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Diversity.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2005.

East, Kathy and Rebecca L. Thomas. Across Cultures: A Guide to Multicultural Literature for Children. Westport, CT: Libraries Unlimited, 2007.

Gates, Pamela S. and Dianne L. Hall Mark. Cultural Journeys: Multicultural Literature for Children and Young Adults. Lanham, MD: Scarecrow Press, 2006.

Gilton, Donna L. Multicultural and Ethnic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the United States. Lanham, MD: Scarecrow Press, 2007.

Lai, Him Mark, Genny Lim, and Judy Yung. Island: Poetry and History of Chinese Immigrants on Angel Island, 1919-1940. Seattle :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1.

Nelson, Emmanuel S., ed. The Greenwood Encyclopedia of Multiethnic American Literature. Westport, CT: Greenwood, 2005.

Norton, Donna E. Multicultural Children's Literature: Through the Eyes of Many Children. Upper Saddle River, NJ: Merrill Prentice Hall, 2001.

Regier, Willis G., ed. Masterpieces of American Indian Literature.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5.
Note: The five complete and unabridged works collected here are parts of a long and passionate testimony about American Indian culture as related by Indians themselves.

作家作品

Abu-Jaber, Diana. The Language of Baklava. New York : Pantheon Books, 2005.
Memoir of growing up with a gregarious Jordanian father who loved to cook.
Sample text: http://catdir.loc.gov/catdir/enhancements/fy0622/2004056828-s.html

Alarcón, Daniel. War by Candlelight: Stories.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2005.

Alexie, Sherman. The Absolutely True Diary of a Part-Time Indian. New York: Little, Brown, 2007.
In his first book for young adults, based on the author's own experiences, coupled with poignant drawings by acclaimed artist Ellen Forney, that reflect the character's art, Alexie tells the story of Junior, a budding cartoonist growing up on the Spokane Indian Reservation.
Sherman Alexie Website: http://www.fallsapart.com/

Agha, Shahid Ali. A Nostalgist's Map of America. New York: W.W. Norton, 1997.
Sample text: http://www.nortonpoets.com/ex/alianostalgists.htm

Agha, Shahid Ali. Call Me Ishmael Tonight: A Book of Ghazals. New York: W.W. Norton, 2003.

Agha, Shahid Ali, ed. Ravishing Disunities: Real Ghazals in English. Middleton, CT: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Hanover, NH: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2000.

Agha, Shahid Ali. Rooms Are Never Finished. New York: W.W. Norton, 2001.
Sample text: http://www.nortonpoets.com/ex/aliaroomsare.htm

Agha, Shahid Ali. The Country Without a Post-Office. New York: W.W. Norton, 1997.

Agha, Shahid Ali. The Half-Inch Himalayas. Middleton, CT: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Hanover, NH, 1987.

Amin, Dina A. Alfred Farag and Egyptian Theater: The Poetics of Disguise, with Four Short Plays and a Monologue. 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ersity, 2008.

Ansary, Tamim. West of Kabul, East of New York: An Afghan American Story. New York: Picador, 2003.

Arana, Marie, ed. The Writing Life: Writers on How They Think and Work: A Collection from the Washington Post Book World.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3.

Arana, Marie, American Chica, Two Worlds, One Childhood. New York: Dial Press, c2001.

Arana, Marie. Cellophane. New York: Dial Press, 2006.

Arana, Marie. Lima Nights. New York: Dial Press, 2009.

Burns, Carole, ed. Off the Page: Writers Talk About Beginnings, Endings, and Everything in Between; introduction by Marie Arana. New York: W. W. Norton, 2008.

Carpio, Glenda R. Laughing Fit to Kill: Black Humor in the Fictions of Slave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2008.

Díaz, Junot. Drown.New York: Riverhead Books, 1996.

Note: The author's debut story collection.

Díaz, Junot. The Brief Wondrous Life of Oscar Wao. New York: Riverhead Books, 2007.

Early, Gerald L. One Nation Under a Groove: Motown and American Culture. Rev. and updated ed.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4.

Early, Gerald L. This is Where I Came In: Black America in the 1960s.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3.

Gass, William H., Naomi Lebowitz, and Gerald Early. Three Essays: Reflections on the American Century. St. Louis: Missouri Historical Society, 2000.

Ilibargiza, Immaculée, with Steve Erwin. Led by Faith: Rising From the Ashes of the Rwandan Genocide. Carlsbad, CA: Hay House, 2008.

Ilibargiza, Immaculée, with Steve Erwin. Left to Tell: Discovering God Amidst the Rwandan Holocaust. Carlsbad, CA: Hay House, 2006.

Jin, Ha. A Free Lif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2007.

Jin, Ha. Waiting.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99.

Jones, Tayari. Leaving Atlanta. New York: Warner Books, 2002.

Jones, Tayari. The Untelling. New York: Warner Books, 2005.

Karim, Persism M., ed. Let Me Tell You Where I've Been: New Writing by Women of the Iranian Diaspora. Fayetteville: University of Arkansas, 2006.

Karim, Persis M. and Mohammad Mehdi Khorrami, eds. A World Between: Poems, Short Stories, and Essays by Iranian Americans. New York: George Braziller, 1999.

Kenan, Randall. The Fire This Time. Hoboken, NJ: Melville House, 2007.

Kenan, Randall and Amy Sickels. James Baldwin. Philadelphia, PA: Chelsea House, 2005.

Kenan, Randall. Let the Dead Bury the Dead. San Diego: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92.

Kenan, Randall. Walking on Water: Black American Lives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Knopf, 1999.

Sample text: http://catdir.loc.gov/catdir/samples/random043/98041730.html

Lee, Jennifer 8. The Fortune Cookie Chronicles: Adventures in the World of Chinese Food. New York: Twelve, 2008.

Marshall, Ann, ed. Home: Native People in the Southwest; with poetry by Ofelia Zepeda. Phoenix, AZ: Heard Museum, 2005.

Nguyen, Bich Minh. Stealing Buddha's Dinner: A Memoir. New York: Viking, 2007.

Power, Susan. The Grass Dancer. New York: Putnam's, 1994.

Power, Susan. Roofwalker. Minneapolis, MN: Milkweed Editions, 2002.

Sharma, Akhil. An Obedient Father.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0.

Shteyngart, Gary. Absurdistan.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6.

Shteyngart, Gary. The Russian Debutante's Handbook. New York: Riverhead Books, 2002.

Sample text http://www.loc.gov/catdir/enhancements/fy0720/2001047676-s.html

Vapnyar, Lara. Broccoli and Other Tales of Food and Lov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2008.

Vapnyar, Lara. There are Jews in My House. New York: Pantheon, 2003.

Sample text http://www.loc.gov/catdir/samples/random045/2003042975.html

Zakaria, Fareed. The Post-American World. New York: W.W. Norton, 2008.

Zepeda, Ofelia. Ocean Power.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95.

Zepeda, Ofelia. Where Clouds Are Formed.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2008.

网站

Academy of American Poets
The Academy of American Poets supports American poets and fosters the appreciation of contemporary poetry through a wide variety of programs, including National Poetry Month (April); online educational resources providing free poetry lesson plans for high school teachers; the Poetry Audio Archive; and the Poets.org Web site. http://www.poets.org

African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Society
Seeks to study African-American literature within the context of contemporary theory and traditional discourse. Expands the appreciation of African-American literature. Encourages students' participation in the study of African-Americ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http://aalcs.marygrove.edu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promotes library service and librarianship, including "Diversity, Equity of Access, Education and Continuous Learning, Intellectual Freedom, and 21st Century Literacy."
http://www.ala.org

American Literature Association
A coalition of societies devoted to the study of American authors.
http://www.calstatela.edu/academic/english/ala2

Before Columbus Foundation
Promotes contemporary, American multicultural literature. It derives its name from the book They Came Before Columbus, which maintains that American literature was already evolving in each American ethnic group before they actually came to North America.
http://www.ankn.uaf.edu/IEW/BeforeColumbus

Celebrating Cultural Diversity Through Children's Literature
Dr. Robert F. Smith, Professor Emeritus, Towson University, Towson, MD

This Web site contains links to annotated bibliographies of children's multicultural books appropriate for kindergarten through grade six. Cultural groups currently listed include African Americans, Chinese Americans, Latino/Hispanic Americans, Japanese Americans, Jewish Americans, Native Americans, and Korean Americans.
http://www.multiculturalchildrenslit.com/

The Kennedy Center's Annual Multicultural Children's Book Festival
The Kennedy Center invites all children, parents, and educators to its annual free Multicultural Children's Book Festival. Books come to life in this afternoon-long series of readings by authors, illustrators, and guest celebrities; book signings; and other interactive performances and events.
http://www.kennedy-center.org/programs/specialevents/bookfestival/

Library of Congress

Center for the Book
The center is a partner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rivate sector.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pays its staff salaries, but it depends primarily on tax-deductible contributions from foundations, individuals, and corporations to fund its projects, publications, and reading promotion events and programs.

http://www.loc.gov/loc/cfbook/

National Book Festival
The first National Book Festival, a collaboration between First Lady Laura Bush and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held September 8, 2001, on the grounds of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and the U.S. Capitol, was such a success that it became an annual event. People came from all over the country to celebrate the diversity of books and of reading.
http://www.loc.gov/bookfest/index.html

Native American Authors
This Web site provides information on Native North American authors with bibliographies of their published works, biographical information, and links to online resources including interviews, online texts, and tribal Web sites.
http://www.ipl.org/div/natam/

Organization of Women Writers of Africa (OWW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that establishes links between women writers from Africa and the African Diaspora.
http://www.owwa.org

PEN American Center
U.S. branch of the world's oldest international literary and human rights organization. International PEN was founded in 1921 in direct response to the ethnic and national divisions that contributed to the First World War. PEN American Center was founded in 1922 and is the largest of the 144 PEN centers in 101 countries that together compose International PEN and is comprised of 3,300 professional members who represent the most distinguished writers, translators, and editors in the United States.
http://www.pen.org/

US-Africa Literary Foundation
Promotes the interests of African writers and makes African writings known and appreciated throughout the world.
http://www.bowwaveo.org

影片资料

The First Generation
Producer: National Educational Television and Radio Center, 1957.
Length: 29 minutes
Black/White
Notes: Our Nation's Roots series
Director: Neal Finn.

Summary: Dramatizes the problems confronting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an immigrant family, the conflicts between a first-generation Polish American and his father, and the influence of native-born children of immigrant families in various fields of endeavor.

Literature and Language of Our Immigrant Kinfolk
Producer: WCBS-TV and New York University
Distributor: National Educational Television and Radio Center, 1957
Length: 29 minutes
Notes: Our Nation's Roots series
Director: Neal Finn
Summary: Explains how many cultures became one because of the immigrant impact on American life; tells how the social novel became a feature of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discusses the influence of the immigrant upon the American language.

A Time for Stories
Producer: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Trust for and in partnership with Prasar Bharti Corporation
Distributor: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Trust, New Delhi, 2004
Director: Rajani Mani
Summary: Documentary film captures Katha Utsav, a literary convention held in January 2004 in New Delhi and through the participants explores the necessity of art and issues of communication and personal identity.
In English, Hindi, and Malayalam with some English subtitles.
Performer: Narration, Atul Kumar; editing, Ankur Mayank, Vikram Russel.

Smoke Signals
Producer: Shadowcatcher Entertainment
Director: Chris Eyre
Writer: Sherman Alexie (Screenplay/book)
Synopsis: The film portrays the relationship of a young Indian man, Victor Joseph, and his father, Arnold Joseph. Victor Joseph and a friend from the Indian reservation, Thomas Builds-the-Fire, travel to Arizona to collect Arnold Joseph's effects after learning of his death. The older man's life is recalled by the men in flashbacks, but their recollections differ. Victor learns things about his father he never knew, and comes to terms with his memories and his loss.

美国国务部对以上资料的内容及其是否可得不承担责任。截至 2009 年 2 月所有链接均有效。